

國史館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參訪 資料蒐集 機關交流合作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其他公務活動_____)

2025 年美國總統檔案史料文物管理及應用 考察計畫報告

服務單位：國史館

姓名職稱：陳館長儀深

歐處長素瑛

廖簡任協修文碩

陳協修昶安

陳協修頌閔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2025 年 4 月 20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報告日期：2025 年 7 月 17 日

考察報告摘要

本館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依法典藏、管理及開放應用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為整合本館資料並聯結國內外資源，加速開放，以提供社會大眾參考運用，自 2020 年 6 月開始執行「歷任總統資料庫」建置計畫，陸續開發建置「蔣經國總統資料庫」、「李登輝總統資料庫」，並於 2025 年起進行「蔣中正總統資料庫」的建置開發。然而所謂總統資料庫不能僅限於總統在國內作為所產生之史料，而應涵蓋影響當時我國運的外國因素。

本次考察之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及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兩位總統任職時間橫跨 1950-60 年代，時值蔣中正總統主政時期，亦是臺灣面臨政治、經濟、軍事危機，風雨飄搖之際。雖然日後在美方的協助下，使臺灣逐漸轉危為安。但探究當時美方的決策，以及國際局勢及臺海形勢的轉變過程至關重要，需要蒐集相關檔案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

本次考察主要心得如次：

一、檔案史料管理部分。

- (一) 重視政府資訊公開，加速資料開放透明。
- (二) 多元保存技術與數位轉型。
- (三) 歷史學研究人員之錄用，著重專業能力及工作經驗；

二、總統圖書館部分。

(一) 臺灣可仿效美國制定《總統圖書館法》與《總統紀錄法》，並修正《檔案法》。

- (二) 功能整合規劃，增進與民眾互動。
- (三) 檔案、展覽、教育推廣三位一體。

三、研究交流分享。

- (一) 蒐集總統圖書館典藏之相關史料，進行重要歷史專題之研究。
- (二)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就本次考察所得，提供建議如下：一、加強與總統圖書館、大學或學術研究機關的互動交流；二、規劃成立歷任總統圖書館隸屬於國史館；三、建立以中華民國臺灣為主體之歷史教育、歷史研究。

本次考察要感謝外交部駐西雅圖辦事處、駐丹佛辦事處之協助聯繫。

目錄

考察報告摘要	i
壹、前言	1
一、考察緣起	1
二、考察目的	3
貳、考察經過	4
一、行前準備及聯繫概況	4
二、考察行程概述	5
參、考察紀要	8
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	8
(一) 考察紀要	8
(二) 座談紀實	9
(三) 館藏檔案史料的調查蒐集	19
(四) 史料舉隅	29
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	40
(一) 機關介紹	41
(二) 座談紀實	42
(三) 考察紀要	46
(四) 館藏檔案史料的調查蒐集	48
(五) 史料舉隅	51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暨紀念碑	61
(一) 機構介紹	61
(二) 主要館藏與當期展覽	62
四、「臺灣轉型正義 ABC：歷史與未來」座談會	64
(一) 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簡介	64
(二) 座談會紀實	64
五、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65
(一) 機構介紹	65
(二) 館藏臺灣資料情況	66
(三) 考察紀要	67
肆、考察心得	69
一、檔案史料管理部分	69
二、總統圖書館部分	69

三、研究交流分享.....	69
伍、建議事項	70
陸、參考資料	71
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相關資料.....	71
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相關資料.....	73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相關資料.....	75
四、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相關資料.....	76

壹、前言

一、考察緣起

本館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依法典藏、管理及開放應用歷任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為整合本館資料並聯結國內外資源，加速開放，以提供社會大眾參考運用，自 2020 年 6 月開始執行「歷任總統資料庫」建置計畫，陸續開發建置「蔣經國總統資料庫」、「李登輝總統資料庫」，並於 2025 年起進行「蔣中正總統資料庫」的建置開發。然而所謂總統資料庫不能僅限於總統在國內作為所產生之史料，而應涵蓋影響當時我國運的外國因素。

此次考察之艾森豪總統圖書館（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及杜魯門總統圖書館（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兩位總統任職時間橫跨 1950-60 年代，時值蔣中正總統主政時期，亦是臺灣面臨政治、經濟、軍事危機，風雨飄搖之際。雖然日後在美方的協助下，使臺灣逐漸轉危為安。但探究當時美方的決策，以及國際局勢及臺海形勢的轉變過程至關重要，需要蒐集相關檔案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

其中，杜魯門總統圖書館之館藏檔案包括：白宮核心檔案（White House Office of Records Management Subject File）、白宮僚屬與辦公室檔案（White House Staff and Office Files）、國家安全會議文件、總統秘書檔案等。較為特殊的總統秘書檔案，是杜魯門指示其私人秘書康威（Rose Conway, 1900-1980）保管，包括國家安全、情報報告、總統機密通訊、講稿、日程紀錄以及其日記中使用的其他零散文件。以白宮核心檔案為主的杜魯門總統檔案，於 1957 年移交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而康威所保管的檔案則至 1972 年杜魯門去世後才移交，並於 1975 年對外開放。總統秘書檔案分為 23 個系列，以杜魯門總統辦公室文件系列（President Harry Truman's Office Files, 1945-1953）為要，收入政治檔案、函電、主題檔案、韓戰檔案、杜魯門日記及筆記手稿等。其他重要館藏尚有國務卿艾奇遜官方談話及會議紀錄檔案（Official Conversations and Meetings of Dean Acheson）、波茨坦會議文件（Potsdam Conference Documents）、杜魯門總統地圖室文件（Map Room Messages of President Truman）、口述訪談資料等。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之館藏檔案中，最主要的兩個全宗為白宮核心檔案及惠特曼檔案。其中，白宮核心檔案為第一大全宗，分為機密檔案、辦公室檔案、一般性檔案、總統個人檔案等系列。機密檔案系列中收入白宮核心文件中較高層級的資料，包含通信、備忘錄、電報、報告等，涵蓋主題豐富，其下再依姓名與主題分為兩個子系列。惠特曼檔案為第二大全宗，惠特曼（Ann Cook Whitman, 1908-

1991) 長年擔任艾森豪的私人秘書，並保管艾森豪的總統辦公室檔案。惠特曼檔案收入函電、備忘錄、日記等，與白宮核心檔案相較，能更深入理解艾森豪實際接觸到的資訊、建議以及所採取的決策與行動。共計 18 個系列，包括艾森豪總統辦公室檔案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s Office Files)、艾森豪總統日記、艾森豪總統內閣會議紀錄及文件 (Minutes and Documents of the Cabinet Meetings of President Eisenhower)、艾森豪總統與國會領袖會議文件 (President Eisenhower's Meetings with Legislative Leaders)。其他重要館藏尚有杜勒斯專檔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國家安全會議文件、口述訪談資料等。

又，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所藏杜勒斯專檔計分為 11 個系列，總計超過 88,000 頁，時間涵蓋 1950 年至 1961 年，包括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 或其幕僚發出的信件和備忘錄的副本、杜勒斯幕僚準備的談話備忘錄，以及與總統、白宮幕僚、杜勒斯幕僚、國務院官員、外國政府官員等的往來函件。雖然杜勒斯捐贈文件時表明是個人性質的資料，在法律意義上或至少按照杜勒斯的定義上可視為「個人文件」，而非國務院的官方紀錄，但文件內容確實反映了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期間與艾森豪總統及白宮幕僚之間的工作關係與業務。

冷戰初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對臺政策，隨著國共戰爭情勢明朗化、蘇中共結盟，以及其後韓戰爆發等局勢發展，經歷劇烈地變動。要言之，國安會編號 NSC37 系列文件對臺灣戰略地位重要性與立場評估，顯示此一變動過程，旨為避免蘇聯有機會在軍事及政治上利用臺灣，排除美方公然軍事介入手段，僅以經濟及外交措施防止臺灣陷入共黨手中，成為獨立於共產中國之外的政治實體。主因有三：其一，蔣介石政權緊守臺灣作為最後基地；其二，臺籍獨立運動團體無法有效運作；其三，臺灣戰略地位重要性尚不致讓美國派兵占領程度。期間，如政策規劃室主任肯楠 (George Frost Kennan, 1904-2005) 曾主張美國應承擔責任，使國民黨政權撤離臺灣，未獲採納。國安會 NSC48 號文件則確認美國有關亞洲立場，以遏制共產主義為宗旨，規劃防衛圈。對美國決策者而言，韓戰的爆發證實其對蘇中共擴張的設想，基於安全戰略、國內政治與心理考慮，促使美國決定動武，並進一步合理化對臺灣前途的重新介入。

此番轉變，基本形成了美國此後近 20 年對臺相關亞洲戰略與國家安全政策框架，旨為維持一個足以與共產中國抗衡、強而有力的臺灣政權，從而與美國整體利益密切配合。美國著名的冷戰史學者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曾指出，戰略的重要性在確保政策與執行措施能服務於所需政治的最終狀態。其經典研究《遏制戰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一書近年增訂出版，將冷戰遏制依時序分為五種戰略，透過歷史研究揭示各種遏制戰略的實施效果及優劣，並於最終章提供從歷史學習的理論架構。又如新冷戰史研究代表學者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全球冷戰》(*The Global Cold War*)一書，則聚焦於第三世界，探討美、蘇於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爭奪，目的為證明各自所信仰價值觀的優越性，自認其意識形態於全球一體適用，卻往往面臨小國操縱大國的現象。吾人或可藉以對照檢視，再思美國對臺政策思維、發展脈絡及其歷史意義。

二、考察目的

(一) 調查及蒐集二次大戰結束至 1960 年代初期臺美關係史資料，以充實歷任總統資料庫之內容。

(二) 考察杜魯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及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有關臺灣史研究與檔案開放現況，洽商合作出版史料或研究成果的可能性，提升檔案運用與研究水準。

(三) 考察杜魯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及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數位化、數位資料加值應用等創新趨勢，觀摩數位時代資料管理、以數位為核心服務的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四) 與杜魯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及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商談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透過數位資料庫與服務平臺，拓展館際合作與交流。

貳、考察經過

一、行前準備及聯繫概況

為加強本館與國際學術交流等因，俾作為本館蒐集、編纂史料及建置「歷任總統資料庫」業務之參考，預計考察美國中部地區重要的學術機構、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等。本次考察由陳館長儀深親自領隊，率修纂處歐處長素瑛、廖簡任協修文碩、陳協修昶安及陳協修頌閔等共 5 人考察美國各機關（構），俾利精進本館業務之發展。

赴美國考察計畫業於本（2025）年 2 月 6 日奉核定，旋即於 3 月 6 日函文外交部，請其駐西雅圖辦事處、駐丹佛辦事處派員協助安排考察相關事宜，並檢附考察人員簡歷、考察目的與重點、考察行程表。期間，承辦同仁與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承辦人胡芷昀科員密切聯繫，溝通本案相關細節以及注意事項。外交部復於 3 月 11 日回函，已將本館考察計畫行程及人員名單，轉請駐西雅圖辦事處、駐丹佛辦事處協處。嗣後，承辦同仁與駐西雅圖辦事處張慧慧副組長、呂韻儀領事針對本考察計畫之細節進行詳盡討論，協助洽排轄內美國機關（構）之拜會及考察。同時與駐丹佛辦事處王絲瑩、林惠儀領事密切聯繫，以利考察。本次考察行程緊湊紮實，共計考察 6 個機關（構）、接洽 30 餘位人員。考察期間與大堪薩斯臺灣同鄉會楊英育教授、郭丕明先生、龔飛濤醫師、西雅圖臺灣同鄉會周昭亮先生、潘素潤先生聯繫考察行程，由潘掬慧女士、張淑娟女士協助口譯。

本考察計畫之機票住宿，皆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核銷報支在案。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星宇航空）班機，去程為 4 月 20 日（日）20 時 10 分桃園至西雅圖班機；回程為 4 月 29 日（二）1 時 15 分西雅圖至桃園班機。行政準備方面，承辦同仁於赴美考察之前，先辦理線上調閱檔案、申請入美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訂購網路卡、出國考察保險、預約登記入境美國資料、請領本館推廣品、採購證書夾印製感謝狀等。前述事項，特別感謝修纂處歐處長素瑛給予諸多寶貴建議，使此考察行程能順遂圓滿。

二、考察行程概述

2025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8 時，國史館考察團由陳儀深館長領隊，率修纂處歐素瑛處長、廖文碩簡任協修、陳昶安協修、陳頌閔協修共 5 人於桃園機場出發。經過 11 個小時的航行，於西雅圖時間 4 月 20 日下午 16 時抵達塔科瑪國際機場（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經西雅圖辦事處協助下，考察團旋即於 18 時辦理轉機，搭乘美國國內線阿拉斯加航空前往堪薩斯。是日 23 點 59 分抵達堪薩斯機場（Kansas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隨即前往下榻飯店。

4 月 21 日，考察團租車前往位於阿比林鎮（Abilene）的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於下午 14 時與該館館長 Todd Arrington 等人進行座談交流。22 日、23 日，考察團成員於該館進行檔案蒐集、博物館考察等事宜，由該館館員 Kristyn Crossley 提供檔案諮詢、應用服務等協助。

4 月 24 日前往位於獨立市（Independence）的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於下午 14 時與該館館長 Mark Adams 等人進行座談交流。座談結束後參觀該館展覽，並前往杜魯門總統故居考察。25 日，考察團成員於該館進行檔案蒐集。是日傍晚結束檔案蒐集工作後，陳館長應大堪薩斯臺灣同鄉會之邀，以〈理解現狀：從 1991 年的李登輝談起〉為題與臺灣同鄉進行座談演講，參與者眾多，回饋踴躍精彩。

4 月 26 日，考察團成員前往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暨紀念碑（National WWI Museum and Memorial），楊英育教授陪同並協助翻譯。下午 14 時，考察團成員搭乘阿拉斯加航空前往西雅圖，於西雅圖時間約 17 時抵達。

4 月 27 日，考察團前往考察華盛頓大學。下午 14 時，參加該校臺灣研究計畫主辦之「臺灣轉型正義 ABC：歷史與未來」座談會。陳館長應邀發表〈研究二二八的核心價值〉演講，內容豐富精彩。4 月 28 日，考察團前往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由該校張雅倫講師（Ellen Chang）接待考察，參觀「歷史的迴響、記憶的呼喚：二二八事件特展」、東亞圖書館書庫。當晚考察團簡單晚餐後，即前往塔科瑪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乘 4 月 29 日凌晨 1 時之飛機。經過近 13 小時的航行，於 4 月 30 日上午 4 時 55 分返抵國門，圓滿完成考察任務。

考察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考察機構	備註
4/20 星期日	臺北→西雅圖機場→堪薩斯機場→密蘇里州獨立市	赴美航程星宇航空 (JX032) (20:10- 16:10) 阿拉斯加航空 (AS 564) (18:28- 23:59)	16:10 抵達西雅圖機場。轉機阿拉斯加航空前往堪薩斯。18:28 起飛, 23:59 抵達堪薩斯國際機場。宿堪薩斯
4/21 星期一	密蘇里州獨立市→堪薩斯州阿比林市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	宿薩納利
4/22 星期二	堪薩斯州阿比林市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	宿薩納利
4/23 星期三	堪薩斯州阿比林市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	宿薩納利
4/24 星期四	堪薩斯州阿比林市→密蘇里州獨立市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宿堪薩斯
4/25 星期五	密蘇里州獨立市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宿堪薩斯
4/26 星期六	密蘇里州獨立市→西雅圖機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	13:00 抵達機場, 14:59 起飛, 16:54 抵達西雅圖機場
		堪薩斯至西雅圖 阿拉斯加航空 (AS 418)	

日期	地點	考察機構	備註
4/27 星期日	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	宿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 座談交流	
4/28 星期一	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前往機場
4/29 星期二	西雅圖→臺北	西雅圖機場 (01:15)	4/29 凌晨 01:15 起飛， 在機上過夜
		星宇航空 (星宇 JX031)	
4/30 星期三	臺北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4/30 (三) 04:55 抵桃 園機場

參、考察紀要

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外觀

(一) 考察紀要

2025年4月21日由陳儀深館長率領考察團前往位於堪薩斯州阿比林鎮(Abilene)的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博物館暨故居(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並於下午14時與該館館長Todd Arrington等人進行座談交流。雙方經過寒暄，並由陳館長致贈國史館館藏1960年艾森豪總統訪問臺北的照片後，即開始進行座談。接下來的幾天，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員亦向考察團展示與臺灣相關的珍貴館藏，包括1960年艾森豪總統訪問臺灣時受贈的禮品(包括，畫作、國旗)及信件等。



艾森豪總統故居

(二) 座談紀實



陳儀深館長致贈本館館藏艾森豪總統訪臺照片與賴總統就職紀念酒予 Todd Arrington 館長

首先，Todd Arrington 館長表達歡迎之意，並表示國史館考察團是他從去年 8 月上任以來，迎接的第一個外國考察團，別具意義。他很樂於回答任何關於總統圖書館營運的問題。接著，他介紹檔案部門的主管 Jim Ginther 博士、實體文物部門的主管 William，兩人各自回答相關問題。

陳儀深館長提問，關於艾森豪總統相關的檔案，依照法律是如何區分私人檔案與公務檔案？在擔任總統期間所產生的檔案當然歸屬於國家；但他也有些早年的私人檔案存放在總統圖書館內，所以如何分辨公務檔案與私人檔案？對於所有權又如何處理？

Jim Ginther 博士答覆指出：「由聯邦政府來專門管理總統的檔案文件是經過一個演進的過程，在艾森豪總統的時代，他的文件還屬於個人資料，並非政府的檔案，總統圖書館所藏的檔案文件都是由他捐獻的。但在 1985 年以後，規定總統的文件屬於政府的紀錄，必須由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NARA) 典藏管理。現在根據美國《總統檔案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的規定，由白宮的檔案管理人員，負責將與總統有關的文件移交到國家檔案館」。

陳儀深館長接著提問，試舉例，如果艾森豪總統有寫日記，他從年輕時期開始寫，然後在卸任總統之後還繼續寫。那麼他的日記全部都屬於國家所有？還是需要與他的繼承人協商，將日記捐贈給國家才可以擁有完整的日記？要如何區分其擔任公職時期寫的日記，或是他私人記述的日記？如何確認日記的所有權？

Jim Ginther 博士答覆：「總統圖書館並不負責區分檔案文件是屬於公務或是私人的，我們主要負責蒐集管理所有與總統相關的檔案文件，並協助研究者得以利用這些資料。例如，關於艾森豪總統的軍旅紀錄，儘管分散在不同的檔案系列，但都是由一位工作人員統一管理。國家檔案館希望我們蒐集每一位總統的完整史料，不限於他擔任總統期間。很幸運的，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堪薩斯州阿比林這裡蒐集到與艾森豪總統生平相關的資料——從他還是個男孩起，直到他進入軍事學院。他很慷慨地捐贈了他的文件，還有許多來自二戰時期軍旅生涯相關同袍的文件。當艾森豪成為總統時，我們當然獲得了總統文件。同時也得到了許多幕僚和內閣成員的文件，以及許多在白宮的其他顧問和幕僚的文件——所有這些都是收藏的一部分。然後是他在離開總統職位、任期結束後所產生的資料，我們會持續主動地蒐集艾森豪總統一生的資料」。

陳儀深館長表示，之所以有這個問題，是有其背景與脈絡的。本館現藏之蔣中正日記，經過司法訴訟，法院判決總統任內的部分屬於國史館，其餘非總統任內的部分則屬於家屬。但為了保持歷史資料的完整性，經過與家屬協商，請他們簽署捐贈同意書，將日記其餘的部分捐贈給國史館，才取得完整的日記，整個過程有些周折。不知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是否曾面臨類似的情形？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自從羅斯福總統開始建立總統圖書館制度以來，我們一直努力嘗試蒐集卸任總統的文件。直到 1985 年，那些我們認為是總統個人文件的資料才被國會認定為國家檔案，也就是說，它們實際上屬於政府而不是總統個人。我們之前獲得文件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向個人索取，但他們沒有義務將文件交給我們。就像蔣介石沒有義務將文件交給政府一樣，但家族最終還是交了出來，這與我們獲得大部分文件的方式非常相似。從總統圖書館創建開始，我們就去問總統及其僚屬，最終獲得了與總統相關的個人文件，共約 450 套，其中包括總統、第一夫人及其他成員的相關文件。現在的機制，在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任內，有來自國家檔案館的檔案管理員駐守在白宮內，他們的工作是定期與白宮人員合作，將成為檔案文件的紀錄轉移到國家檔案館內。在總統任期內就開始執行這項工作，然後在總統任期結束時，會進行資料的全面轉移。國家檔案館的人員也會與總統僚屬聯絡，試圖充實相關的紀錄。雖然法律沒有規定他們必須交出所有的紀錄，但有些紀錄會被移轉和蒐集。例如國務卿，有定期的國務院紀錄要轉移到國家檔案館，這與白宮的紀錄完全不同，其中一些紀錄會轉移到國家檔案館，會有一個完整的管理流程來識別獨特的紀錄，並確保它們被轉移。所以自從 1985 年以來，白宮不能拒絕交出關於總統的紀錄，那些紀錄屬於聯邦政府，由國家檔案館管理」。

陳儀深館長提問，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口述歷史的部分。除了檔案文件之外，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是否有主動徵集艾森豪總統過去故舊僚屬的口述歷史，並且要如何管理這些資料？這些資料將有助於對艾森豪本人及其施政的理解。

Jim Ginther 博士回答：「我們為了蒐集資料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我們有好幾個檔案櫃的通信紀錄，紀錄我們去找總統的故舊僚屬，請求他們將文件捐贈給檔案館。他們沒有義務交出文件，除非他們曾在任何政府職位工作過。我舉一個例子，艾森豪總統的兄弟米爾頓（Milton S. Eisenhower）曾參與某些政策的制定過程，在他擔任政府公職時所產生的紀錄，我們可以拿取。但他擔任大學校長時所產生的其他紀錄則不行」。

陳儀深館長接著說，所以我們專程前來蒐集與查閱杜勒斯國務卿的檔案，因為他曾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以及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在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戰也有重要角色。此外，也想詢問杜勒斯的檔案為何會放在艾森豪總統圖書館？

Jim Ginther 博士答覆指出，杜勒斯是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有一些檔案文件是他擔任國務卿時產生的；有些是他作為總統顧問履行職務時產生的。那些涉及國務院行政事務的文件，要作為國務院紀錄的一部分。但像電話對話、與總統的私人通信，或著是尚未正式化的政策文件草稿，這些被認為是個人的，他可以將它們捐贈到任何他想要的地方；但他選擇將它們捐贈給我們。許多總統顧問也會捐贈紀錄，因為他們希望我們盡可能擁有完整的總統任期內的檔案文件。依法律規定，杜勒斯必須將國務院的相關紀錄交給國家檔案館，但其他的文件，像個人筆記、備忘錄、個人保存的副本，則被捐贈到了這裡。

我舉一個例子說明，例如我發電子郵件說今天要與你見面，那是正式的國家檔案館的業務。當我完成後，相關紀錄必須存放於聯邦政府。但 Todd 館長和我今天早上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這次會面？可能會問什麼問題？需要向你們展示什麼？這算是非正式的討論。所以像國務卿杜勒斯個人文件的價值，在於它經常告訴我們那些沒有發生過，但被考慮過的，以及國務院執行的決定過程等相關的事情。但個人文件通常給我們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可以瞭解整個決策過程。

陳儀深館長表示，我們大致知道，臺灣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作為公務員，來往的公務文件都會經過一個歸檔的程序，變成檔案。可是個人的筆記，例如前總統馬英九很喜歡寫筆記。如果是總統的筆記，依本國法律規定，總統的筆記是屬於國家的，但有些國家可能不是這樣規定。所以杜勒斯願意主動地把這些豐富的個人文件捐給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彌足珍貴。



國史館考察團與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之座談會

修纂處歐素瑛處長提問，按照美國的《總統檔案法》，艾森豪總統任內的檔案應該都已經移至總統圖書館了，請問目前徵集的檔案，是哪一方面的檔案？此外，國史館也典藏了許多艾森豪總統相關的檔案，貴館是否有計劃徵集在國外的檔案文件？

Jim Ginther 博士答覆指出，關於國外的檔案文件，白宮或政府機構會保留任何發送給外國政府的文件副本，所以我們會有副本，或是一份影印的副本。通常白宮不會直接處理發送到外國的信件或文件的副本，而是透過國務院或其他執行政策的聯邦機構來處理。總統圖書館內主要專注於總統任內相關的檔案文件，我們不可能管理國務院、國防部或其他聯邦機構所產生的文件，即使在艾森豪時代也是如此。因為數量太多，以現有人力只能專注於與總統職位有關的部分。

Todd Arrington 館長補充表示，關於是否還能徵集到檔案文件？答案是肯定的。儘管艾森豪總統已過世 50 餘年，還是能徵集到相關的檔案文件。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先舉幾個例子，大約一年半到兩年前，艾森豪總統的孫子向我們移交了幾箱與 1952 年總統競選相關的文件，其中包括當時的候選人艾森豪在競選總統期間的所有演講以及一些競選策劃文件。此外，我正在努力完成艾森豪總統的私人醫生霍華德·史奈德（Howard M. Snyder）文件資料的捐贈與整理。史奈德從二戰後成為艾森豪總統的私人醫生，曾編製一份關於總統健康狀況的紀錄，從艾森豪進入西點軍校開始，涵蓋其人生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這些紀錄中，包括史

奈德醫生每天對總統的觀察日誌、周圍發生了什麼事，這如何影響他的健康，以及他因各種疾病接受治療等紀錄。

歐素瑛處長提問，一般來講，美國的總統圖書館兼具有圖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三種功能。目前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是不是有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方向是由館方來決定，還是依照研究人員自身的研究興趣？

Jim Ginther 博士答覆表示，總統圖書館的主要職能是蒐集、保護、保存資料，並使這些資料可供利用；但我們不擔任歷史學家的角色，不對資料進行詮釋。我們會策劃展覽，或是與總統職業生涯相關的節目，但我們的職能不是撰寫歷史，而是使紀錄可供撰寫歷史使用。其中一個原因，是國家檔案館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我們的工作不是推廣特定議題、個人或政黨或其他任何東西，我們的職能是讓使用者做出如何利用資料的決定。

陳儀深館長提問，我們在兩年前曾考察過加州的雷根總統圖書館，有詢問他們與國家檔案館之間的關係。總統圖書館本身有成立基金會，圖書館的建立、營運、導覽都是由基金會負責。可是關於檔案的部分，則是由華府的國家檔案館來管理，這樣負責的比重到底是如何？根據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圖書館的負責人說明，差不多是 20% (國家檔案館) 與 80% (基金會) 的負擔比例。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在人員或是經費的分攤上，是否也有這種比例？

Todd Arrington 館長回答表示，每一個總統圖書館都有一個基金會、一個非營利的合作夥伴，幫助處理不同的事務，包括提高知名度、籌集資金等。有些圖書館的基金會幾乎包辦所有的事情，而國家檔案館扮演的角色較小；有的總統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幾乎處理所有的事情，而基金會的角色相對較小。

在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在檔案館或博物館工作的員工，都是國家檔案館的員工。我們的基金會叫做艾森豪基金會，實際上他們負責籌集資金來幫助我們進行宣傳與廣告。比如說，你們在過來的路上看到高速公路上的任何廣告招牌，都是由基金會的資金來支付的。艾森豪基金會在總統圖書館基金會中屬於規模較小的，但基金會正在成長，比過去更大更活躍。基金會主要負責的是教育推廣，他們為學齡兒童、青少年，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設計了很多計畫與節目。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由聯邦政府擁有文物與檔案是最好的方式。國家檔案館在其中的角色主要是確保屬於美國人民的檔案文物得到保護，讓它們由專責的工作人員負責管理。文物部門主管 William 也表示，基金會幫助支付推廣行銷及策展的費用，並辦理教育計畫。所以當客座講者來訪，以及當我們為學校團體做特別節目時，那筆錢也必須由基金會支付。

Todd Arrington 館長表示，目前個人手邊沒有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和基金會確實的分攤比例，但行銷、推廣教育、策展的費用都是由基金會負責，他們籌集資金和

總統圖書館一同進行事務。但本館的工作人員及行政人員皆隸屬聯邦政府，國家檔案館負責維持檔案館、博物館、行政部門的正常營運。

陳儀深館長提問表示，我們需要知道基金會與總統圖書館的關係，雖然這屬於內部事務。因為臺灣正在學習總統圖書館的制度，我們將參考韓國的方式，以及美國的做法。瞭解總統圖書館與基金會的關係、各自負責的事務，以及政府到底要幫忙到什麼程度等，這些都還在思索與考慮。

Todd Arrington 館長接著表示，我們很樂意談論這件事。但這很難概括說明，因為每個總統圖書館和基金會的運作方式都有些不同。例如，雷根總統圖書館是一種營運模式，如果你們去德州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圖書館，那裡的基金會幾乎包辦所有的事務。但在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幾乎由國家檔案館負責大部分事務，除了之前提到由基金會負責的部分。這種基金會與總統圖書館之間關係的演變，與基金會的規模有關，也與時空背景有關。所以考察 15 個總統圖書館，可以看到 15 種不同的關係與模式。

我會說總統圖書館的營運是一個合作努力的成果。一些基金會規模夠大，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日常營運。艾森豪總統基金會正在成長，並為我們做很多事情，但他們沒有能力接管場館的全面營運，所以需要國家檔案館和每個個別基金會的合作協調，來決定事務的分際。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政府有法律規範我們作為總統圖書館必須執行的事務，我們必須採取某些步驟來保護收藏品。由法律規定的工作，通常由國家檔案館來支付費用。因為基金會的資金是變動的，我們不能完全倚靠基金會或是私人費用。法定事項主要由國家檔案館來支付，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務，就會變成混合的情況，取決於項目的種類、規模、基金會的資源多寡。基金會對營運的資助規模是可以調整的。

國家檔案館是聯邦政府的一扇窗戶，我們的工作是保持透明，使人們能夠透過窗戶看到政府每天在做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保持中立、不做詮釋。為了確保這一點，國家檔案館非常致力於保持中立性，支付的都是法律規定的，以維持透明度的事務。由政府承擔這些費用，以確保美國人民能夠以不經過濾的方式接觸到政府事務的紀錄。所以我向那些來做研究的人們解釋，基本上我們的工作是讓你們能夠盡可能地與艾森豪直接對話，而不是妨礙你們。雖然艾森豪總統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我要盡可能讓你們接近直接對話，沒有其他干擾或詮釋妨礙你們進行研究。



國史館考察團與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之座談會

陳昶安協修提問，國家檔案館和總統圖書館雖然隸屬於聯邦政府，但會和地方政府，比如說市政府有合作關係嗎？目前館藏文件大約 3,000 萬件，都是以艾森豪總統為中心，並依照一個固定的標準做蒐集。但是與艾森豪總統相關的議題非常多，從早期生活、二戰到戰後擔任總統。想請問蒐集資料的標準是如何？

Todd Arrington 館長回覆指出，我們在地方上做了很多計畫與節目是關於艾森豪總統的日常生活，以及政府的各個面向。我們確實會主動聯繫當地媒體機構，也與阿比林社區有很多合作，試圖讓人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希望人們把這些事情放在電視、廣播上或網路上，讓人們知道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在某一天會有很棒的節目。再者，我們在總統圖書館系統中也是相當獨特的，因為我們在一個相當小的城鎮，不像羅斯福總統圖書館位在紐約市外圍，或是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就在堪薩斯城外面。我們希望被視為阿比林社區的一部分，讓人們有歸屬感，他們可以在外面遛狗，或是來參加圖書館的節目。這裡不是一個只為研究者而設置的地方，雖然我們也很歡迎研究者前來，但我們非常希望成為社區的一部分，而且確實有很多人專程來阿比林參觀總統圖書館。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我們確實有選擇標準。國家檔案館為我們定義了這個標準，所蒐集的材料必須由總統或他的故舊僚屬或與總統有關的人產生的，都是與總統有某種關聯性的。但這是國家檔案館的政策，我們並不總是嚴格遵守這個標準。現在總統圖書館主要專注於總統的活動、生活及其故舊僚屬的紀錄。

我們只負責保存檔案文件，並沒有選擇艾森豪總統說了什麼，或是選擇國務卿說了什麼，這就是文件所呈現的。如果你不喜歡或你對此有不同感受，或你有其他證據，那是歷史學家做的事，不是我們的工作。實際上，依照國家檔案館的政策，禁止我們驗證文物的真實性或任何其他事情。我們不做價值評估，不涉入文物價值或詮釋性決定。我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依據規定確認文物是否歸屬總統圖書館。比如說，我們會蒐集來自艾森豪的親密同事巴頓（Patton）將軍的東西。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蒐集所有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艾森豪部屬的資料。我們必須做出決定，蒐集來的資料必須與總統有關聯性。同樣地，如果艾森豪的童年朋友，想捐贈他寫給在西點軍校的艾森豪的信件，我們會接受，因為其與艾森豪相關。但如果是阿比林當地超市的某人想提供紀錄，只因為那是艾森豪成長的城鎮，那麼我們不會接受，因為與艾森豪沒有直接關聯。所以資料不一定要在總統任內產生，但它必須與這個人有關聯性。

總統圖書館不僅有著檔案館的功能，也是一個歷史遺跡，包括總統的故居、總統圖書館。沒有 William 所主管的文物收藏，我無法完成工作；沒有檔案文件，也無法在博物館進行展覽，兩者密切相關，我們所有的資源包括檔案文件、文物可供使用，這是我們的一大優勢。

陳儀深館長表示，此行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考察關於總統圖書館制度的建立與營運，瞭解中央政府與總統圖書館之間的關係。二、是關於資料蒐集與研究，此次來訪的團員兼具研究者的身分，對於艾森豪本人或是杜勒斯的檔案都有興趣，特別是杜勒斯國務卿的檔案。我們會特別花時間蒐集，以作為歷史研究的資料。另外，國史館（Academia Historia）不僅蒐集檔案，也會蒐集其他資料與文物，包括重要人士的日記、總統與副總統受贈的禮品等項目。

Todd Arrington 館長表示，我們確實有很多來自國務卿杜勒斯的文件。至於我們在聯邦政府內部組織架構是如何？總統圖書館是國家檔案館的一部分。而國家檔案館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不隸屬於國防部、商務部、農業部或內政部，是一個獨立機構。而 15 個總統圖書館，都是總統圖書館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層級結構，有一個指揮層級，作為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的館長，我報告的對象是總統圖書館辦公室的負責人。

陳儀深館長補充說，在臺灣，國史館也是一個行政機構，隸屬於總統府。

陳頌閔協修提問，想請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營運；一個是關於研究的部分。剛剛討論了史料徵集，這些徵集進來的史料會全部開放運用嗎？運用上是否有所限制？第二個問題，是國史館在 20 年前曾經來考察過貴館，剛剛進來看到整個園區有很多新穎的建築。目前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有什麼重要的營運策略嗎？比如說，導入 AI 等最新技術，是不是目前發展的重點？

Jim Ginther 博士回答表示，我們能夠公開任何依法律規定可以公開的資料，但有一些資訊類別是不能公開的。如果有關國家安全機密，例如與國防政策或與其他國家的秘密談判等。但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可以對民眾開放的。我們有責任保護任何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料，因此仍有少量不能釋出的資料受到保護。又，根據美國《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們不能提供那些受法律保護的個人資訊。這可能是需要和基金會進行協商的部分。我們有來自國家檔案館的授權，並進行數位化，使資源可供公眾使用，但資金一直是個問題。

Todd Arrington 館長表示，我們正在慢慢地將檔案資料數位化，希望能加快速度，但即使有很多新設備，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收藏了 3,000 萬份文件，窮一生之力可能也無法完成，所以數位化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剛開始嘗試使用人工智慧，但那還處於非常早期的試驗階段。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並沒有開始啟用 AI，我們正嘗試數位化更多的資料，以提供公眾使用。

但我要說的另一件事，是我們希望加強與阿比林社區的聯繫。這個社區依賴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作為地方經濟的推動力，希望繼續吸引人們造訪這裡，所以我們必須斟酌要在網路上公開多少資料，相對於人們親自來這裡考察、查閱資料，更多的人是來參觀我們出色的博物館。我們需要人們的造訪與消費，以支撐社區的經濟與活力，所以我們不想成為一個完全數位化的檔案館，仍然希望人們來這裡做研究，也讓他們考察這個美麗的地方與博物館，並且能更瞭解艾森豪總統。

Jim Ginther 博士接著表示，談到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的挑戰之一，就是它擅長識別資訊，但不擅長識別脈絡。另一個問題是人工智慧正在為你決定你應該看到什麼，這又和透明度有關。例如，我們想看國務卿杜勒斯的文件，總共有 40 個箱子。但我只給你第 2 個和第 12 個箱子，你會假設那就是所有的資料。當 AI 在決定你能看到什麼時，我們如何繼續確保脈絡和透明度？所以仍然有人的因素存在，檔案管理員在未來仍然有存在的必要。AI 確實很有價值，可能在多年以後，我們會將 AI 完善成實用的工具，但可能不想看到人們缺乏與檔案館的互動。

陳儀深館長表示，臺灣現在也在實驗 AI，就是人文方面的研究。例如，李登輝總統基金會要推廣關於李登輝總統的資訊，讓大眾更瞭解李登輝總統，方法之一，就是要將很多李登輝總統的檔案資料輸入電腦，讓 AI 分析檔案資料，並模擬李登輝總統，進行實體的問答。AI 的回答雖然綜合了很多種資料，對於教育推廣的用處比較大，但對於研究而言，只能做為參考。

Jim Ginther 博士表示，我個人的擔憂是，你和我都知道 AI 研析與實際研究的差別，但一般學生恐怕不知道其中的差別。如果你對我的一切了解，都基於我 30 年前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生時寫的東西；而你把那當作是我現在的樣子，以及我現在會如何回答問題，這樣的理解會有問題。所以我對這些技術工具沒有意見，只是想

確保我們能正確地使用它們。最後，陳儀深館長致贈國史館藏艾森豪訪臺照片予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並與 Todd Arrington 館長合影留念，座談會圓滿結束。

(三) 館藏檔案史料的調查蒐集



在檔案室調查蒐集檔案

1、館藏檔案簡介

艾森豪總統圖書館館藏檔案中最主要的兩個全宗為白宮核心檔案及惠特曼檔案。其中，白宮核心檔案為第一大全宗，分為機密檔案、辦公室檔案、一般性檔案、總統個人檔案等系列。機密檔案系列中收入白宮核心文件中較高層級的資料，包含通信、備忘錄、電報、報告等，涵蓋主題豐富，其下再依姓名與主題分為兩個子系列。惠特曼檔案為第二大全宗，惠特曼長年擔任艾森豪的私人秘書，保管艾森豪的總統辦公室檔案。該檔案收入函電、備忘錄、日記等，與白宮核心檔案相較，能更深入理解艾森豪所實際接觸到的資訊、建議以及所採取的決策與行動，共計 18 個系列，包括艾森豪總統辦公室檔案、艾森豪總統日記、艾森豪總統內閣會議紀錄及文件、艾森豪總統與國會領袖會議文件。其他重要館藏尚有杜勒斯文書、國家安全會議文件、口述訪談資料等。

2、蒐集資料標的

(1) 杜勒斯—艾利森編年系列，時間涵蓋 1951 年 6 月至 1952 年 4 月，共 4 千餘頁文件。該系列記錄杜勒斯擔任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1893-1971) 的大使級顧問期間之經歷，期間杜勒斯被賦予二戰同盟國與日本的多邊和平條約談判以及美日雙邊安全條約談判，艾利森 (John M. Allison, 1905-1978) 於條約談判期間擔任杜勒斯的特別助理。該二條約於 1951 年 9 月 8 日同日簽署。

該系列依時序排列，並於資料夾中依時間倒序排列。文件類型包括信函、備忘錄、談話備忘錄、電報、聲明、摘要以及條約草案，反映亞洲和歐洲各國對條約談判的關注之處、美國國會及國防部於條約討論及批准過程中的參與，以及與日本相關的具體問題。部分函件由杜勒斯起草，並由國務卿艾奇遜簽署。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3 盒。依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Box 1: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ne 11-30, 1951] (1) [Meet the Press interview; Korea; Japanese peace treaty; Ryukyus; Japanese ratification] ;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ne 11-30, 1951] (2) [Japanese peace treaty; Italian interest in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ne 11-30, 1951] (3) [letter to John D. Rockefeller r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U.S.; Anna Dulles will; Japanese peace treaty; letter to George C. Marshall re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inese participation and the future of Formosa in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suggested statements by U.S. and U.K. regarding China and peace settlement];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15, 1951 (1) [Japanese rearmament; corres. with American Embassy Manila re Japanese reparation; security treaty consid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S.; Italy's 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peace treaty;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sam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15, 1951 (2) [Japanese peace treaty; George C. Marshall; draft of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proposed Japanese Peace Conferenc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15, 1951 (3) [Japanese peace treaty and Japanese rearmament];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15, 1951 (4) [Japanese peace treaty; John D. Rockefeller];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6-31, 1951 (1)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John D. Rockefeller and U.S.-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6-31, 1951 (2) [Japanese peace treaty; treatment of Japanese delegation at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July 16-31, 1951 (3) [concerns by Philippines over draft Peace Treaty; the role of the Philippines in Pacific securi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1)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2) [Japanese peace treaty; radio address draft r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Ryukyus; George C. Marshall];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3) [Japanese peace treaty; restoration of Japanese Swiss franc balances to U.K.; high seas fisheries; U.S.-Philippine Security Treaty; George C. Marshall];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4) [Japanese reparations to Allied Powers; Japan and Chinese Communist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and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Korean sovereignty over Dakdo and Parangdo Island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5) [redrafting of peace treaty as proposed by Philippin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Senator Harry Cain's protests re Republic of China not invited to signing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Tripartite Treaty between 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umors re Japan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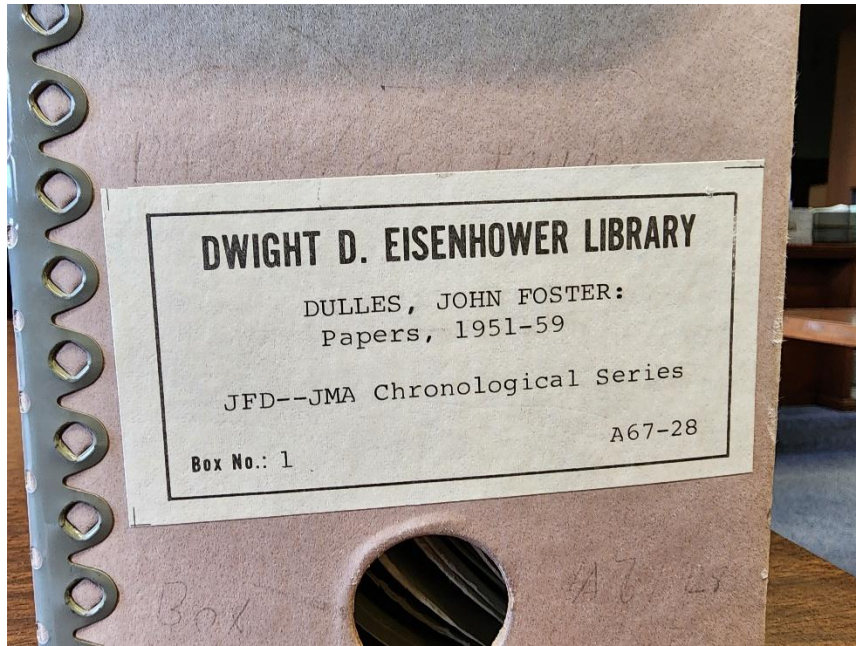
Chinese Communists; Japanese support of Peace Treaty; Australian fisheries; Philippine questions re Japanese reparation; Philippine concerns re mutual assistance arrangement among Pacific Island nations and U.S.; Japanese Peace Treaty draft; Italy and Japan];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15, 1951 (6) [Philippine questions re Japanese reparation; Japanese support of Treaty; Paul Hoffman and Commission of Church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6-31, 1951 (1) [Paul Hoffman; Henry Luce;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Mutual Assistance Treaty between U.S. and Philippines; response to Senator Jenner's five objections to Japanese Peace Treaty; fishing industr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6-31, 1951 (2) [Japanese compensation of American citizens for damage to property in China;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Philippines' concern over bilateral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6-31, 1951 (3) [Joint Chiefs of Staff comments regarding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6-31, 1951 (4)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participation i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use of American bases in Philippines by Forces of Third Powers;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invite Indochina to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August 16-31, 1951 (5) [mistreatment of Dutch by Japanese; high seas fisheries; proposed statements re Russian attendance at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Box 2: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15, 1951 (1)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assistant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15, 1951 (2)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ior to JFD's absence from office];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15, 1951 (3)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participation i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Senate ratification of four Pacific Treaties; Paul Hoffman and Ford Foundation re Japan and John Rockefeller];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15, 1951 (4) [memcon with Foreign Minister Herbert Morrison re Japan and Chinese Communist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secretary during his absence to attend Japanese Peace Treaty Conference in San Francisco, CA];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15, 1951 (5) [JFD's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U.S. delegation as co-sponsor of the Draft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uggested statement by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Netherland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6-30, 1951 (1) [routine correspondence; thank you's; invitations declined; portrait of daughter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geru Yoshida; praise for Colonel C. Stanton Babcock];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6-30, 1951 (2)

[routine correspondence; thank you's; invitations declined; commentary upon the terms of the Philippine-U.S. Mutual Defense Treaty;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conclusion of Philippine-U.S. Mutual Defense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6-30, 1951 (3) [report to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secretary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conclusion of Australia-New Zealand-U.S. Tripartite Security Treaty; commentary on the terms of the Tripartite Security Treaty; ratification hearings on Japanese Peace Treaty; summary of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conclusion of U.S.-Japanese Security Treaty];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September 16-30, 1951 (4) [commentary on the terms of the U.S.-Japanese Security Treaty;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secretary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conclusion of Tripartite Security Treaty; South Sakhalin and Kurile Island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1) [routine correspondence by John M. Allison and JFD; JMA's address at the Far East Conference of the Far East-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New York];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2) [proposed Japanese-American Seminar; JFD's comments re President's support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proposed appointment of General Mark Clark to The Vatican; memcon with Madame Pandit re India; Americanism award presented to JFD by Grand Street Boys' Post;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lans for November trip to Japan];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3) [JFD's support of DDE vs. Senator Taft; views on draft and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ratification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and related Security Treaties;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emcon with Senator Bourke Hickenlooper r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Holthusen and Pickam law firm in installing televisions in Japan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meeting with Chiang Kai-shek];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4) [Japanese reparation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5)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assistant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President Truman's offer of ambassadorship to Japan; United Nations prayer room; ratification of peace treaty; status of Pacific Island nations treaties]; CHRONOLOGICAL--JFD and JMA October 1-31, 1951 (6) [South Sakhalin and Kurile Islands; draft comments re Japanese Security Treaty and Pacific Island nations treaties; outline of talk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e Japan]

Box 3: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November, December 1951 (1) [Ryukus];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November,

December 1951 (2) [memcon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Wellington Koo, re Japan and China relations; Formosa; admission of Communist regime to United Nations; objection by British Ambassador to JFD's action re Japanes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 China;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secretary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November, December 1951 (3) [list of major open matters with the Japanese; press release re JFD address at the Citation Dinner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Cleveland, OH, "The Free East and the Free West"; statement for Brotherhood Week; peace doll];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November, December 1951 (4) [Tokyo visit itinerary; First Mortgage 6½% Sinking Fund Gold Bonds of the Daido Denryoku Kabushiki Kaisha; Formosa; routine correspondence prepared by JFD's assistant during his absence from office];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November, December 1951 (5)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January 1952 (1) ["Japanese Peace Treaty: Questions and Answers"; views on Republican Party];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January 1952 (2) [future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avorite Bible verse; New York Republican Club; statement by JFD to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and the Security Treat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Japan; Winston Churchill];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January 1952 (3) [response by the British to the release of 12/24/51 letter from Prime Minister Yoshida to JFD];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January 1952 (4);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January 1952 (5) [United Nations; Richard Nixon; China;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covenant on human rights];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February 1952 (1)-(3) [Senator Jenner's criticism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John Foster Dulles' analysis of his campaign for U.S. Senate];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March 1952 (1)-(3) [human rights; China; Yalta; Senator Jenner's reservations on Japanese Peace Treaty]; CHRONOLOGICAL JOHN FOSTER DULLES April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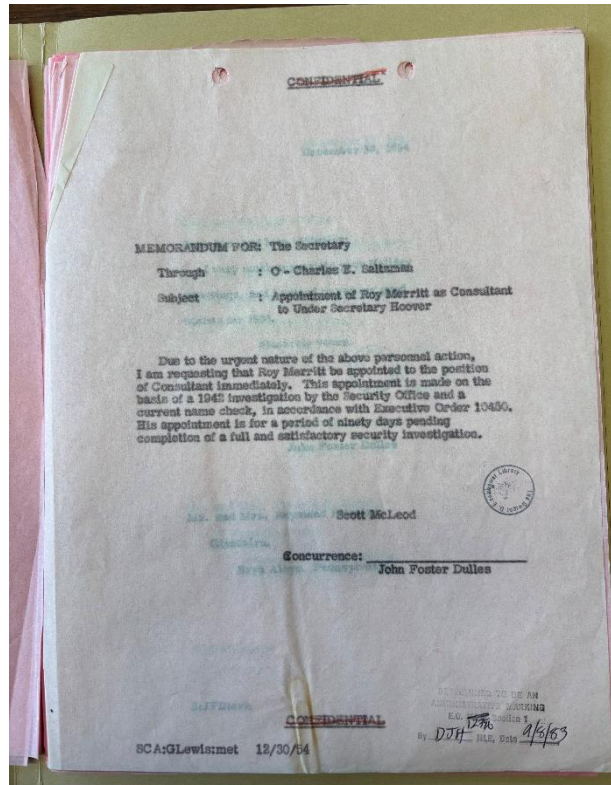


杜勒斯專檔 1951 年-1959 年，Box1

(2) 杜勒斯編年系列，含約 13,600 頁，時間涵蓋 1952 年 12 月至 1959 年 5 月。該系列依時序排列，並於資料夾中依時間倒序排列，文件類型包括信函、備忘錄、談話備忘錄以及電話對話備忘錄。大部分文件為杜勒斯簽署的對外信函副本，發函對象包括聯邦政府人士、私人以及若干外國政府官員；部分文件為杜勒斯與政府行政部門各官員、國會議員、外國政府官員和私人談話的備忘錄。杜勒斯所收函件則很少出現在該系列中。

該系列文件內容，涵蓋從例行的簡短確認信函至反映杜勒斯政策觀點的信函及備忘錄，主題十分廣泛，從系列中可找到許多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期間所關注問題的參考資料。但該系列至今仍有少量文件尚未解密，另有若干文件依贈與契約封存。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6 盒。依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Box 8: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ne 1954 (1)-(6) [China and Geneva Conference; monitoring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United Kingdom; United Nations; Formosa; USSR; Thailand; Korea];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ne 1954 (1)-(3) [telephone call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ly 1954 (1)-(7) [Syngman Rhee; Wriston Report on foreign service; Anthony Eden and the Far East; Indochina; Cathay-Pacific incident; Panama Canal; US leadership and alliances; SEATO; monitoring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UK and USSR];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ly 1954 (1)-(4) [telephone calls]



杜勒斯編年系列，Box 8

- Box 9: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ugust 1954 (1)-(6) [China; Southeast Asia; Vietnam; deterrence and the Far East; Korean currency; Japanese trade; official visits; Iran; comments on draft presidential speech];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ugust 1954 (1)-(3) [telephone call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September 1954 (1)(2) [Winston Churchill; Indochina; EDC];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September 1954 [telephone call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October 1954 (1)-(6) [Australia; Formosa; economic policy; Viet Minh and MDAP equipment; Formosa];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October 1954 (1)(2) [telephone calls]
- Box 10: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November 1954 (1)-(6) [Viet Minh and Geneva accords; Korea; John Paton Davies case; FOA and economic aid; William Donovan; VOA broadcasts; Japan; 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December 1954 (1)-(8) [economic policy; Manila Pact; nuclear testing; Dulles's thesis of retaliatory power; Japan; China];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anuary 1955 (1)-(6) [imprisoned US airmen; Formosa situation; Dag Hammarskjold and China]
- Box 13: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December 1955 (1)-(6) [cotton program; post-Geneva policies; India; USSR; Middle East; USSR and Japan; France and Vietnam; plain letter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anuary 1956 (1)-(4) [development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mmigration; USSR];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March 1956 (1)(2)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US prestige; USSR and foreign visitors; disarmament];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pril 1956 (1)-(4) [mutual security; Philippines; SEATO; atomic weapons; USSR];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May 1956 (1)-(3) [Middle East and Communist China; USSR and cold war; OTC; East-West trade; Burma; mutual security bill; executive pay];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ne 1956 (1)(2) [Burma; Australia and China; PL 480];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ly 1956 (1)(2)[communist party; East-West exchanges; UN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

Box 15: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ly 1957 (1)(2) [disarmament; Korea];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ugust 1957 (1)-(3) [Communist China; mutual security; nuclear testing; USSR and aid to neutral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September 1957 (1)-(3) [disarmament; mutual security; Red Chinese correspondents; Chiang Kai-shek; disarmament];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October 1957 (1)-(4) [mutual security; China; USSR and nuclear weapon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November 1957 (1)-(3) [UK and defense; defense spending; NATO];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December 1957 (1)-(3) Paul Hoffman and mutual security; UK and NATO; UN Development Loan Fund];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anuary 1958 (1)-(3) [summit meetings; Dean Acheson and George Kennan; Soviet economic warfare; Laos; Arab-Israeli problem];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February 1958 (1)-(3) [Okinawa; USSR and disarmament; proposed summit; mutu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law; NATO];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March 1958 (1)-(3) [Asia; summit meeting; Japanese treaty; Taiwan; Vice President Nixon and summit meeting]

Box 16: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pril 1958 (1)-(4) [nuclear testing;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disarmament; Law of the Sea and bloc voting; India and Pakistan; UN and disarmament; Sam Rayburn and mutual security; Burma; Okinawa; Korea; social contacts with Soviet officials; USSR and nuclear testing; Dulles's fall-out cellar; China passport question];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May 1958 (1)-(3) [personnel security case;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USSR and nuclear testing; summit conference; Japan and Kurile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ne 1958 (1)-(4) [passports and communism];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July 1958 (1)-(4) [Nuclear testing; Khrushchev and summit

meeting; Soviet exchanges; Dag Hammarskjold; China];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August 1958 (1)(2) [Formosa Straits; Nuclear testing; disarmament];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September 1958 (1)-(3) [Quemoy; US and UK; Dean Rusk and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and re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talks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October 1958 (1)-(3) [Formosa; Senator Alexander Smith and Far Eastern policy; UN Disarmament Commission];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November 1958 (1)-(3) [Defense budget; Germany; arms control; USIA broadcasts; Formosa; United Nations]; JOHN FOSTER DULLES Chronological December 1958 [Thailand; Formosa]



館方展示特色館藏。

左為 1960 年艾森豪總統到訪臺灣後所收之畫作。右為蔣宋美齡贈送艾森豪總統親筆繪畫。

(3) 史密斯系列，含約 1,600 頁備忘錄及筆記，時間涵蓋 1957 年 11 月至 1961 年 1 月。史密斯 (Gerard C. Smith, 1914-1994) 為艾森豪政府國際核能事務專家，1954 年任核能事務國務助卿，1957 年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該系列記錄史密斯任職國務院期間的經歷，文件常見主題包括基本國家安全政策、核戰略、軍控談判等，反映史密斯有關美國對蘇聯戰略態勢思考，並涉及 1958 年臺海危機、中東、巴拿馬運河等其他國家和地區。但該系列至今仍有少量文件尚未解密，另有若干文件依贈與契約封存。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3 盒，依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 Box 1: Material From Gerard C. Smith's Files 1958 (1)-(7) [China, Chiang Kai-shek and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military planning and Formosa Straits crisis; NSC as device for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policy process; China and war threat; NSC meeting of May 1, 1958 and discussion of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aper; UK and China; Far East Chiefs of Mission meeting re Philippines, Korea, Japan, Vietnam, Laos, Communist China, Australia, Thailand, Cambodia, New Zealand, Burma, Singapore, Okinawa, and Taiwan]
- Box 2: [Notebook] General 10/1/58 - 1/10/59 [Formosa, Chiang Kai-shek and China; outline of tasks of American diplomacy]
- Box 3: [Notebook] NSC 1957-1958 [defense matters; intelligence; shelter program; nuclear weapons; [Notebook] NSC 1958-59 [missiles; Eisenhower comments on nationalism; USSR; Quemoy & Matsu; civil defense; nuclear power;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4) 主題系列，含約 9,600 頁信函、備忘錄、談話備忘錄、講稿及聲明稿、電話談話備忘錄、報告、印刷品等，時間涵蓋 1952 年 11 月艾森豪總統大選至 1959 年 5 月杜勒斯病逝。該系列為了解杜勒斯擔任國務卿期間的重要資訊來源，記錄杜勒斯對許多關鍵問題的思考，包括美國戰略態勢、中東衝突、朝鮮半島、越南、美國與其盟友關係等，亦涉及國務院內部人事、組織等爭議問題。但該系列至今仍有少量文件尚未解密，另有若干文件依贈與契約封存。本次蒐集標的包括該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5 盒。依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 Box 5: Churchill-Eden Visit June 25-29, 1954 (1)(2) [Churchill's views on World War II, USSR, Communist China and nuclear matters]; File Received from Mr. Herbert Hoover, Jr. Office (1)(2) [Senator Knowland re United Nations and China]
- Box 6: Kennan, George 1-0-1;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 1957 NATO "Think Piece" 1956 (Drafts) (1)(2); Vice President Nixon (1)-(5) [politics; vice presidential trips, summit conferenc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congressional relations;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Formosa situation; Korea]
- Box 8: Korea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plan to end Korean War; Dulles' memos to DDE re Korea]; Confidential - Memos and Letters (1)-(3) [Chiang Kai-Shek;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lations with the Vatican; Australia and Douglas MacArthur; Stalin and meeting with DDE]
- Box 11: RED CHINA [Divider]; Wang - Johnson Talks, Prisoners of War 1955 (1)-(6)
- Box 12: Miscellaneous [Roderic O'Connor Memoranda] (1)-(5) [passports to Communist China; press criticism of Dulles; appointment of disarmament negotiator; congressional support]

(四) 史料舉隅

(一) 國務院杜勒斯辦公室草擬美國復蘇聯有關對日和約備忘錄稿(1951年7月5日)

《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及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Part 1) 二冊收入包括美國為與日本達成和平條約及安全協議所做的努力、相關條約簽署及行政協議的進行、從占領和控制日本到重新武裝日本等政策相關文件近 460 件。然而該二冊分別於 1976、1977 年出版時，仍有許多文件尚未解密。本次蒐集資料得見 1997 年 12 月解密之美國政府於 1951 年 7 月復蘇聯政府有關對日和約備忘錄稿，以下將備忘錄稿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is occasion to allude to the not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of June 10, 1951, respon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ide Memoire of May 19, 1951.

Section 1 of the note of the Soviet Union dealt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proposed Peace Treaty. However, that memorandum fails to cite any language of the draft treaty to which objection is taken. In substance, the Soviet memorandum objects not to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e treaty but because the treaty does not restrict Japan with respect to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 right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inher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would have the peace treaty deny to Japan the right hereafter to enter into collective security arrang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of its choosing. This is a viewpoint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ccept.

Section 2 of the Soviet Memorandum of June 10 deals with procedure. It again “insists on observance of the Potsdam Agreeme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requires the preparation of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by the veto-bound processes of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composed of four countries excluding France and many Pacific and Asiatic countries which bore a far heavier burden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than did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Government’s Memorandum of June 10 does not attempt any reasoned reply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otsdam Agreement contained in Section I of the United States Aide Memoire of May 19, which proves irrefutably that the Potsdam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mentions nor relates in any way to the Japanese peace, probably because the Potsdam Agreement was made on August 1, 1945, before

Japan's surrender and when the Soviet Union was still a neutral in the Pacific war.

In the concluding paragraph of its note of June 10 the Soviet Government says that the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should be multilateral" and the "no country participating in war with Japan should be excluded in preparation of signing the treaty."

The text enclosed herewith reflects the operation of those very principles. No nation represented on 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has been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at text. If the multilateral scope of the eventual peace treaty is diminish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will be as the result of the choi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not because of exclusion by the other powers concerned.

The final paragraph of the Soviet memorandum suggest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onference in July or August 1951 for consideration of available drafts of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ticipates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ference early in September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on the basis of the enclosed revised draft, in the preparation of which all of the Allied Powers principally concerned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elcome participation in that conference, and adherence to the resultant treaty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美國政府藉此機會為蘇聯政府 1951 年 6 月 10 日照會回應美國 1951 年 5 月 19 日備忘錄提出答覆。

蘇聯照會的第一部分涉及擬議的和約實質內容。然而該照會並未引用和約草案中任何遭到反對的措詞。蘇聯照會實質上反對的並不是和約中的任何內容，而是因為和約並未限制日本的單獨或集體自衛權，而該項權利為《聯合國憲章》承認的「固有」權利。蘇聯政府希望和約剝奪日本今後與其選擇的其他國家達成集體安全協議的權利。此為美國政府不能接受的觀點。6 月 10 日蘇聯照會第 2 部分涉及程序，再次「堅持遵守《波茨坦協定》」。依據蘇聯政府的說法，該協定要求通過外長會議具否決權之程序，準備對日和約。然而外長會議由四個國家組成，不包括法國及許多亞太地區國家，而此等國家承受日本侵略負荷比蘇聯要沉重許多。

蘇聯政府 6 月 10 日照會並未試圖對美國 5 月 19 日備忘錄第一部分有關《波茨坦協定》的分析作出任何合理的答覆，而該備忘錄無可辯駁地證明，英國、蘇聯及美國之間的《波茨坦協定》根本並未提到或涉及日本和平，這可能是因為《波茨坦協定》於 1945 年 8 月 1 日簽署，當時蘇聯在太平洋戰爭中仍維持中立。

蘇聯政府 6 月 10 日照會最後一段表示：「對日和約應是多邊的」，「在準備簽約時不應排除任何與日本交戰的國家」。隨附的文本反映了此等原

則的運作，並無任何遠東委員會成員國被排除於該約制定之外。若最終和約的多邊範圍因蘇聯的缺席而縮小，那也是蘇聯選擇的結果，而非排除其他相關大國。

蘇聯備忘錄的最後一段建議於 1951 年 7 月或 8 月召開會議，審議現有對日和約草案。美國政府預計將於 9 月初召開會議，以所附修訂草案為基礎締結和約，所有主要相關盟國均有機會參與該約的準備工作。美國政府歡迎蘇聯政府參加會議並遵守由此產生的和約。」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JFD-JMA Chronological Series, Box 1)

(二)國務院致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有關與臺北當局就對日和約會商情形電報 (1951 年 7 月 6 日)

本次蒐集資料得見上述《美國外交文件》出版後、1984 年 5 月解密的一件電報，國務院就安排臺北當局與日方單獨簽署雙邊和約協商有關進度，致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下將電報內文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We have today handed CHI AMB for his confidential INFO July 3 text of proposed JAP peace treaty and have informed him that you are instructed, which you hereby are, similarly to give copy to FONMIN for his confidential INFO. At that time FIS express to CHI GOVT our appreciation of certain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which have been made by that GOVT and which we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Note particularly ART 2 (a) with express recognition of independence of Korea; ART 2 (c) which eliminates ORIG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between Sakhalin and Formosa; and ART 10 which elaborates spec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which are renounced. Earlier date of beginning of CHI war would presumably be reflected in the bilateral China-Japan peace treaty.

For your background INFO we have been having frequent talks with CHI AMB. It seems his GOVT may become reconciled to bilateral treaty, provided it can reasonably be assumed JAP will want to deal with NATL GOVT and that timing of signature and coming into force of bilateral treaty will be such as not to put NATL GOVT in invidious position. We do not yet know to what extent we can meet CHI on this point because of overriding considerations such as general agreement of free world community to bring JAP back into community of nations, but we shall consider sympathetically any reasonable arrangement consistent with the foregoing, but in no event do we think such signature could precede or exactly coincide with multilateral signature.

Since CHI AMB has himself expressed doubt regarding ability his GOVT to provide ratification which would bind all China, we have asked him to consider

whether his GOVT would, at time of signature of bilateral, accept some defined qualification of its power and if so, what would that qualification be. We pointed out that this might facilitate and expedite China-Japan bilateral but also that it might embarrass NATL GOVT position in the UN and its organs. We have had no reply on this point but expect to continue talks.

For your further background INFO July 3 text may be published about July 12. No QTE bargaining UNQTE about JAP gold. UK wanted it applied for reparation but we refused.”

「我們今日已將擬議的對日和約 7 月 3 日版草案送交中華民國大使〔顧維鈞〕，作為機密參考文件，並告知他您將據此依指示將副本送交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同樣作為機密參考文件。當時我方對中華民國政府所提出某些建設性提議，表達感謝，這些建議已被納入考慮。請特別注意第 2 條 (a) 款明確承認韓國獨立；第 2 條 (c) 款消除了庫頁島與臺灣的原本差別待遇；第 10 條規定放棄在中國之一切特權及利益。對中國戰爭爆發時間往前界定，應會反映在中日雙邊和約中。

在此提供您背景訊息，我們經常與中華民國大使會談。看來他的政府可能會接受雙邊和約，只要能合理地假設日本願意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並且雙邊和約的簽署和生效時間不致使國民黨政府處於不利地位。由於自由世界社會普遍同意讓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等首要考慮因素，我們尚不知道在此點上能多大程度滿足中方的要求，但我們將同情地考慮任何與上述內容一致的合理安排，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認為此項和約的簽署能先於多邊和約或與多邊和約同時。

由於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本人對其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對全中國具有約束力的批准書表示懷疑，我方已要求他考慮其政府在簽署雙邊協議時是否能接受對其權力的若干明確限定，以及若是能接受的話，那麼該限定是什麼。我方指出，此舉可能會促進並加速中日雙邊關係進展，但也可能損害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及其機構中的地位。我方尚未收到關於此點的答覆，但預期將持續談判。

提供您進一步背景訊息，7 月 3 日版草案可能於 7 月 12 日左右公布。並未對日本黃金『討價還價』。英國希望以黃金賠償，但我方拒絕了。」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JFD-JMA Chronological Series, Box 1)

(三) 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等會談備忘錄 (1958 年 8 月 12 日)

《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Document 31*) 收入由白宮幕僚長古德帕斯特 (Andrew Goodpaster) 所呈該次會談備忘錄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Whitman File, DDE Diaries) 中有關臺灣周邊局勢討論段落。依據該會談備忘錄，杜勒斯表示，該地區局勢正在

「升溫」，而過去 5 年來國民黨政權已將金門和馬祖此等近海島嶼緊密納入保衛臺灣的行動之中，若金馬失守，國民黨認為將無法守住臺灣，士氣將崩潰，蔣介石的控制也將喪失。杜勒斯雖然並非要求做出決定，但建議關鍵在於評估士氣，或許應將攻擊此等島嶼視為對臺灣的攻擊。杜勒斯並進一步指出，中共和蘇聯可能正聯手試探美國，看看蘇聯擁有彈道飛彈（ballistic missiles）是否會動搖美國的決心。在杜勒斯看來，失去臺灣將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致命打擊。艾森豪則認為，金馬本身對中共進一步攻擊臺灣的影響不大，如此進攻首先需要航運，但表示美國若真的要捲入任何規模的戰爭，必須立即召集國會。艾森豪建議杜勒斯在記者會上聲明，此等島嶼如今已與臺灣緊密相連，對其發動全面攻擊，則美國無法不介入。

本次蒐集資料得見杜勒斯觀點之同次會談備忘錄，內容有些微但重要之差異。相較於古德帕斯特所呈該次會談備忘錄，依據杜勒斯觀點之同次會談備忘錄顯示，杜勒斯主張美國介入中共侵犯金馬行動的主張更為直接、強烈。古德帕斯特備忘錄中，杜勒斯主要表達的是國民黨人觀點；從杜勒斯角度而言，主張干涉中共行動，更加是其個人認知到金馬與臺澎在政治及心理層面上難以分割，將中共進犯金馬與蘇聯及共產主義陣營擴張相連結，尤其視中共行動為對美國的挑釁與試探，美國因之必須堅決表態。以下將有關段落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I spoke of the Quemoy-Matsu situation and of the fact that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give a further warning to the Chicomos about this situation. I said that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islands into the Formosa-Penghu complex had been such that I doubted whether there could be an amputation without fatal consequences to Formosa itself. The President pointed out that this was not true from a military standpoint, and I indicated my agreement with that but did say that the connection from a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ndpoint had become such that I thought now it would be quite dangerous to sit by while the Chicomos took Quemoy and Matsu. I said that I had the feeling that the Communist bloc might now be pushing all around the perimeter to see whether our resolution was weakened by the Soviet possession of nuclear missiles, but I felt confident that if it appeared that we were standing firm, then they would not take action that would risk precipitating a large-scale war.

The President indicated that I might say something along these lines with reference to Quemoy and Matsu at a press conference.”

「我談到了金馬局勢，並表示或許有必要就此向中共發出進一步警告。

我指出，過去 4 年來，此二島嶼與臺澎的整合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我懷疑如果將其分割開來，臺灣本身是否會遭受致命的後果。總統指出，從軍事角度來看，情況並非如此。我對此表示同意，但我也表示，從政治和心理角度來看，此種聯繫已經如此緊密，以至於我認為，眼睜睜看著中共占領金馬，坐視不理會將非常危險。我表示，我感覺共產主義陣營現正可能全面推進，試圖看看我們的決心是否因為蘇聯擁有核彈而受到削弱。但我相信，如果我們表現出堅定立場，他們就不會採取可能引發大規模戰爭的行動。

總統表示，我可以在記者會上就金馬發表類似言論。」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JFD Chronological Series, Box 16)

(四) 國務卿杜勒斯致總統艾森豪函稿及附件備忘錄 (1958 年 9 月 27 日)
《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Document 136*) 收入杜勒斯致艾森豪同一信函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Whitman File, Dulles-Herter Series)，但未收入其附件備忘錄。在該信函中，杜勒斯表示無法讓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主席麥克洛伊 (John J. McCloy) 接受以特使身分訪臺勸說蔣介石放棄金馬的提議，並附上麥克洛伊為答覆杜勒斯於 27 日同日所提交備忘錄。依據白宮電話通聯紀錄，杜勒斯是在前一晚即 9 月 26 日向麥克洛伊提出建議，希望麥克洛伊能配合國防部部長麥艾樂 (Neil H. McElroy) 訪臺。本次蒐集資料得見該附件備忘錄，從更多層面提供吾人探究艾森豪、杜勒斯等人對處置臺海危機的不同考量，以下將備忘錄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MEMORANDUM

Dear Foster,

I have thought long and hard over your thought regarding a visit to Chiang.

I am doubtful about it particularly at this stag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In reviewing my association with him I doubt that I have had such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as to justify the belief that I could persuade him into a course of action to which he is apparently solidly opposed. If he recalls me at all clearly it is probably in connection with unpleasant decisions.

If voluntary action is sought I would think that Walter or you could be more persuasive than I for you both have so steadfastly supported him that he would be inclined to listen better to Walter or another with the same record than to an outsider.

He did yield to pressure during the war but only when it came direct and from on high.

Second: I really fear that my inclinations would go further in the way of concessions respecting Quemoy and Matsu than the Department or you feel it is wise to go.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feel I would be a poor emissary. Moreover, I do not really know yet how far you want him to go in view of the somewhat uneasy position he holds on Taiwan.

Third: I fear that any hope of getting Chiang to go along with what I feel the situation demands by persuasion is so remote that I can only see the likelihood of increased rigidity in his attitude at a time when something may emanate from Warsaw which would clarify our position and our objectives- making the chance of his cooperation less likely when the need for it is greatest.

Fourth: I must confess that I see something akin public relations-wise to the ill-fated mission of General Marshall to Chiang. Again a friend of the President's is called upon to induce Chiang to moderate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Communists. The parallelism would not be lost on the China block and the columnists and no "cover" would be so good as to fool anyone for long. I think there would be less risk in this area if a visit were made by someone from the regular staff such as Robertson or Bob Murphy.

I do feel that some proper avenue to the UN can be found (assuming the failure of the Warsaw talks) which though displeasing to Chiang (and perhaps also to the Reds) would not be fatal to our Far Eastern position. Thinking along this line is, I am sure, going on but it would seem as if it should be pretty far advanced so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be made fully ready by the time of the break up of Warsaw.

I am sorry that I feel that whatever help I can give would not take the form of a mission or visit to Formosa at this time, but I am prepared at any time to sit down with any of your planners or with you to try to help work out a course of action and then do what I can to enlist support for it.

John J. McCloy"

「備忘錄

致福斯特，

我對您有關由我拜訪蔣介石的提議已作了長時間且深刻的考慮。

我對此提議深表懷疑，尤其是在目前階段，原因如下：

首先：回顧我與他的往來，我懷疑我與他的關係是否足以讓我有理由相信我能說服他採取他顯然堅決反對的行動。如果他清楚地記得我，那很可能

與一些不愉快的決定有關。

如果尋求讓他主動行動，我認為饒伯森〔Walter S. Robertson，遠東事務國務助卿〕或您將比我更具說服力，因為兩位都如此堅定地支持他，他會更傾向於聽從饒伯森或其他有同樣經歷的人的意見，而不是聽從一位局外人的意見。

他過去在戰爭期間，確實曾屈服於壓力，但前提是這種壓力是直接來自高層的。

其次：我確實擔心，在金馬問題上，我的意願會比國務院或您所認為明智的做法要更進一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不是個稱職的使者。此外，鑑於蔣介石在臺灣問題上多少令人不安的立場，我目前尚不清楚您希望他進展至多遠。

第三：透過勸說讓蔣介石接受我提出局勢所需的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以至於我認為，在華沙可能出現若干足夠釐清我方立場和目標的跡象之際，他的態度只會變得更加強硬，使得在我方最需要之際，更難獲得他的合作。

第四：我必須承認，從公關角度來看，我看到的情況與過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對蔣介石那次命運多舛的拜訪類似。再度是總統委請友人說服蔣介石緩和他對共產黨的態度。中國問題專家和專欄作家們不會忽視此種相似之處，而且任何「掩飾」都無法長久地欺騙任何人。我認為，如果由饒伯森或墨菲〔Robert D. Murphy，政治事務副次卿〕這樣的正式幕僚訪問，在這方面的風險可能會較小。

我確實認為可以找到某種透過聯合國的合適途徑（假如華沙會談失敗），這雖然會讓蔣介石（或許也令共產黨）不悅，但不致造成我方對遠東立場的致命打擊。我相信，我們一直沿著這條思路思考，但似乎應該提前進行，以便在華沙會談破裂時，能將提案完全準備好。

很遺憾，我目前無法以出使或訪問臺灣的形式提供任何我能提供的幫助，但我隨時準備與任何一位策劃者或您本人一起坐下來，協助制定行動方案，並盡我所能爭取支持。

麥克洛伊」

（Source: Eisenhower Library, JFD Chronological Series, Box 16）

（五）惠特曼檔案收入總統艾森豪與臺灣事務相關文件（1955年1月-1960年12月）

惠特曼檔案為艾森豪私人秘書惠特曼保管之艾森豪總統辦公室檔案。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方所提供該全宗有關臺灣事務文件清單如下：

NO.	BOX NO.	FOLDER TITLE	TYPE	CREATOR/AUTHOR	RECIPIENT	SUBJECT/TITLE	DATE
1	10	Formosa Area U.S. Military Operations	Note			Notes of meeting with Admiral Radford, CCJS; Admiral Oren Deputy CNO; and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Hoover regarding Chinese aggression in Taiwan Straits Crisis.	1/30/1955
2	10	Formosa Area U.S. Military Operations	Note			Notes fro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Secretary of State Lodge, Admiral Radford et al regarding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1/30/1955
3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2)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thanking DDE for suppor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and general agreement on the threats posed by communism.	7/20/1956
4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4)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to DDE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5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5)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regarding the activities of irregular Chinese forces in Burma.	10/8/1953
6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6)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or his son Ching-Kuo and regarding his son'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9/10/1953
7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7)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supporting DDE's efforts to contain communism and his view that this policy is bringing about the peace initiative in Korea.	4/15/1953
8	10	Formosa	Draft	Dwight	Chiang	Letter fragment clearly stating	?

NO.	BOX NO.	FOLDER TITLE	TYPE	CREATOR/AUTHOR	RECIPIENT	SUBJECT/TITLE	DATE
		(China) 1952-1957 (7)		D. Eisenhower	Kai-shek	U.S does not want to be limited in its response if the situation should change in Communist China	
9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7)	Draft	Dwight D. Eisenhower	Richard M. Nixon	Letter expressing DDE's hope that an amendment withdrawing U.S. funding from the U.N. if Communist China is seated will be defeated in the Senate and dispatching Nixon to convey this message. Letter also reiterates Administration policy on the value of the UN.	6/2/1953
10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7)	Draft	Dwight D. Eisenhower	Richard M. Nixon	Letter expressing DDE's hope that an amendment withdrawing U.S. funding from the U.N. if Communist China is seated will be defeated in the Senate and dispatching Nixon to convey this message. Letter also reiterates Administration policy on the value of the UN.	6/2/1953
11	10	Formosa (China) 1952-1957 (7)	Note	Madam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s on election to the presidency.	11/7/1952
12	10	Formosa (China) 1958-1961 (1)	Note	Madam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Thank you note for the gift of a painting.	12/13/1960
13	11	Formosa 1958 (3)	Not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Holographic notes on options to be used in defense of Taiwan.	9/2/1958

NO.	BOX NO.	FOLDER TITLE	TYPE	CREATOR/AUTHOR	RECIPIENT	SUBJECT/TITLE	DATE
14	11	Formosa (China) (Far East Trip) 6/12-26/60 (5)	Not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Note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15	11	Formosa (China) (Far East Trip) 6/12-26/60 (8)	Correspondenc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16	11	Formosa (China) (Far East Trip) 6/12-26/60 (8)	Correspondence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17	11	Formosa (China) (Far East Trip) 6/12-26/60 (8)	Corresponde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Dwight D. Eisenhower	Letter bearing blue ministry seal in Chinese calligraphy. No. 010236	?
18	11	Formosa (China) (Far East Trip) 6/12-26/60 (8)	Note	Madame Chiang Kai-shek	Dwight D. Eisenhower	Thanking DDE for visit to Taiwan and giving so much of his time and himself during the visit.	6/25/1960

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

4月24日下午，考察團前往位於密蘇里州獨立市（Independence）的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約13時30分抵達。Mark Adams 館長、Sam Rushay 執行長親自接待。由潘掬慧女士、龔飛濤醫師、張淑娟女士協助翻譯。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正門



國史館考察團於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大廳留影

（一）機關介紹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 1945 年至 1953 年任內處理過許多重大事務，包括投擲原子彈決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之初的應對、馬歇爾計畫、韓戰等對 20 世紀具有深遠影響之事件。杜魯門總統於 1953 年卸任後，開始思考如何保存、整理並對外展示他在任期間與政治生涯的所有檔案史料。在此之前，美國總統的個人文件、政府紀錄、演講稿、書信、備忘錄等資料，多由私人保存，尚缺乏制度性的保存與開放機制。1955 年，美國國會通過《總統圖書館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首度將總統文物的保存制度化，鼓勵卸任總統籌建圖書館以保存相關紀錄，之後再移交給聯邦政府管理，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就是在此法令制度支持下成立的第一座總統圖書館。

更重要的是，杜魯門曾親自參與圖書館的設計規劃，並在家鄉密蘇里州獨立市（Independence, Missouri）興建。他深信歷史資料應該公開保存，並提供社會大眾查閱與學術研究之用。他在 1957 年圖書館啟用時曾公開表示：「這些文件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美國人民。」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是一個結合聯邦政府管理與民間參與合作的典型例子，其營運模式可分為兩個主要機構：1、國家檔案館 NARA 是美國聯邦政府所屬的官方機構，負責接管總統圖書館建立後的管理，包括檔案整理、典藏維護、學術查詢管理、館舍維護、安全保全等業務。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是 NARA 之下第一批正式納入管理的總統圖書館之一，也由此開創出「總統圖書館制度」的標準化發展典範。NARA 的職責還包括設計公眾閱覽機制、保障資訊取得權、設置數位資料庫、與學術機構合作發表研究成果等。此外，NARA 也會定期進行文物修復、設備升級與展覽空間改造等工作，確保檔案長期保存與現代化展示。2、杜魯門圖書館學會（Truman Library Institute）：這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機構，負責圖書館的資金籌措、教育活動規劃、展覽企劃、公共關係推廣與民間捐贈連結等任務。該學會成立於圖書館籌備期間，起初即協助募得超過 170 萬美元興建經費，並持續至今為圖書館提供各種營運支援。

館內依功能區分為：1、閱覽研究室：提供學者查閱原始資料與歷史文件，採預約制度。2、博物館展區：展示總統生平、歷史時刻（如原子彈決策、柏林空運）、個人文物、外交禮品與家庭物品等。3、教育中心：舉辦校園考察、教師研習營、模擬歷史活動等。4、紀念區：包括杜魯門與妻子貝絲的墓園。5、會議與活動空間：舉辦座談、論壇與特展開幕活動等。

為提升吸引力與教育效益，圖書館於 2019 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翻新工程，總經費達 3,000 萬美元。新展區於 2021 年重新開幕，強化互動體驗與多媒體展示，並融合現代教學理念，特別聚焦於年輕觀眾的歷史啟蒙。同時，研究資源也朝向數位化發展，大量館藏已掃描上網供免費查閱，例如與冷戰、韓戰、原子能、聯合國等主題有關的文件，便於學術使用與教育推廣。

（二）座談紀實

陳儀深館長首先說明來意，並感謝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方的接待。他表示此行的目的為考察艾森豪總統圖書館與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臺灣一直在學習有關總統圖書館的制度，除了亞洲地區的韓國之外，美國亦是我們積極借鏡學習的對象。而歷史悠久的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運作方式、典藏檔案，是國史館考察團這兩天要密集學習的對象。接著，陳館長介紹考察團成員，隨即開始進行座談。

陳館長首先請教 Adams 館長，兩年前國史館曾考察尼克森總統圖書館、雷根總統圖書館，兩位總統對於 1970、80 年代臺灣的政治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而今(2025)年考察艾森豪總統圖書館、杜魯門總統圖書館，這兩位總統對於 1950、60 年代臺灣的歷史發展也至關重要。尤其杜魯門總統橫跨了 1949 年此一關鍵年度，這一年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遷移至臺灣。1950 年，美國政府如何看待當時臺灣在國際政治舞臺的意義？杜魯門接不接受中華民國到臺灣？這些歷史問題影響深遠，至今仍是各方密切注意的焦點。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與臺灣命運息息相關的《舊金山和約》，正是在杜魯門總統執政時期所簽訂的。其相關的檔案資料，亦是我們此次蒐集史料的重點。



國史館考察團與杜魯門總統圖書館長 Mark Adams（中座者）等人座談

陳館長接著表示，希望能瞭解杜魯門總統與 NARA 之間的關係。以雷根總統圖書館為例，維持該館營運的雷根總統基金會（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 Institute)¹，挹注該館豐厚的資源，對於該館的館務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此次考察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得知該館主要決策者為 NARA 所派駐的政府公務員。因此想瞭解杜魯門總統圖書館、NARA 與杜魯門圖書館學會 (Truman Library Institute) 的關係。

Adams 館長回應陳館長的提問，他認為陳館長所提是關鍵且核心的問題。他指出，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於 1957 年成立至今已逾 70 年，由於館舍老舊，近期進行了大規模的翻修工程，工程款項所費不貲。主要經費來源由 NARA 所提供，館內各部門主管、工作人員皆由 NARA 派駐。聯邦政府的經費用來支付員工的薪資、日常水電費用等營運所需費用；展覽、教育推廣活動及研究發展等經費，則仰賴杜魯門總統學會的挹注。綜而論之，相較於學會而言，NARA 提供較為長期且穩定的資源。

由於 Adams 館長以經費為例說明，陳館長進一步指出，雷根總統基金會楚里歐 (David Trulio) 會長曾表示，基金會負擔該館約 80% 的經費。因此想請教杜魯門總統圖書與學會的情形。Adams 館長回應，他認為雷根基金會負責 80% 的支出，屬於比較高的比例。以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經費比例而言，學會與 NARA 的角色較為平均，雙方共同推進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館務運作與維繫經營。過去數十年來，除了前述的整修計畫係由 NARA 提供的大額預算，其他支出皆由雙方共同協力運作，並沒有偏重一方的情形。

復次，Adams 館長指出，一般而言新近的總統圖書館，由於該總統的後人及相關僚屬皆尚具有一定的新聞熱度，因此在募款上較容易獲得社會大眾的迴響。以杜魯門總統而言，現已是其第三代為主要執行者，故在募款上較為困難。Rushay 執行長補充說明，像是雷根、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等新近的圖書館，多會成立遊客中心、教育推廣部門，而早期成立的總統圖書館則較缺乏此計畫，也會影響募款的情況。

其後，陳館長就總統檔案的徵集提問。陳館長表示，每一位美國總統的國務卿、幕僚團及智囊團的表現，對於該總統的施政皆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以艾森豪總統圖書館而言，國務卿杜勒斯的檔案即至關重要。就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而言，是否有典藏國務卿艾奇遜 (Dean Gooderham Acheson)² 的檔案，或是與其相關的口述歷史資料？業管研究部門的 Rushay 執行長回應，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典藏一部分的艾奇遜專檔，主要是其在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備忘錄、與總統的互動資料等。

¹雷根總統基金會暨紀念中心 (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 Institute)。

²艾奇遜 (Dean Gooderham Acheson, 1893-1971)，又譯艾奇生，美國人，出生於康乃狄克州。曾於杜魯門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務卿，並在 1949 年其任內編寫《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收錄其專檔最詳盡的典藏單位，係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圖書館。

陳館長進一步請教 Rushay 執行長，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是否有進行口述歷史的計畫，或是已針對相關人物進行了錄音訪談？Rushay 執行長回應表示，杜魯門總統圖書館長期以來皆有進行口述歷史的計畫，截至目前的館藏而言，已經訪問了 500 多位與杜魯門總統相關的重要人物。這些訪問錄音，已經做成逐字稿並且公開在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網站上。使用者可以透過關鍵字以及人物姓名進行檢索。這些資料對於研究杜魯門總統與美國現代史，具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同時，杜魯門總統時代的重要人物大多已凋零逝世了，若其後人有意捐贈相關紀錄給杜魯門總統圖書館，館方皆持歡迎且開放的態度。然而，若是這些資料或口述記錄已經典藏在其他單位，例如前述的艾奇遜專檔，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會予以尊重並建議存放於原典藏機關為宜。

同時，陳館長表示在網站上檢索瀏覽之〈艾奇遜訪問紀錄〉，係由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所編輯整理。請問為何是由國家公園管理局來訪問艾奇遜？Adams 館長表示，由於杜魯門總統故居位於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管轄範圍內，故早期的部分訪問係由該局所主導進行。同時由於該局與 NARA 皆屬於美國聯邦政府的一環，故兩者有著合作的夥伴關係。

歐素瑛處長在感謝 Adams 館長及 Rushay 執行長的熱情接待後，歐處長提問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內是否有編制專責之研究人員？Rushay 執行長表示，總統圖書館並沒有研究人員的編制，但在實務上，各個總統圖書館皆歡迎歷史學家與研究人員的到訪並進行研究。就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職掌而言，該館盡可能地公開紀錄、提供目錄，以供研究者來此蒐集史料，進而做出高品質的研究成果。近年來，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投入大量的經費，將館藏檔案進行數位化作業，便利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使用。

歐處長進一步提問，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沒有編制研究人員，則目前館內相關的展覽是否係由館方自行研究規劃？或是委由外部學者專家設計？Adams 館長表示這是很好的問題。他回覆指出，杜魯門圖書館的組織主要分為研究策展、教育人員、文物典藏、檔案管理等。策展係由館內人員來設計進行展覽，再配合館內各部門的合作，例如相關館藏展品及教育推廣等，進而將展覽呈現公開。Adams 館長表示，舉凡展覽等推廣活動，大多是配合相關的週年、紀念日，例如今年是杜魯門總統自 1945 年起擔任美國總統的 80 週年、韓戰爆發 75 週年。

歐處長接續提問，以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為例，是由總統的家屬或後人管理學會或於圖書館擔任重要職務。就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及杜魯門學會而言，杜魯門總統的第三代後人若對於檔案公開及學會營運方向具有其主張，是否會造成館務推

動的影響？Adams 館長讚許歐處長指出了核心議題。Adams 館長表示，目前杜魯門總統的後人以克利夫頓·杜魯門·丹尼爾（Clifton Truman Daniel）為最年長的家族代表，他是杜魯門總統的外孫，亦是杜魯門學會的名譽董事，長期支持圖書館的運作。在檔案公開方面，由於杜魯門總統在其卸任後，將其所有史料均贈予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因此在典藏上較無爭議。同時，隨著美國於 1978 年通過修正《總統檔案法》，規定總統的私人文書不需要典藏於總統圖書館，但總統任內產生的文件、文物均須依法保存。所以新近的總統圖書館，在檔案公開上會牽涉較為複雜的法律問題。Adams 館長表示在實務上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問題，他以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為例說明，尼克森總統的文件、錄音檔在公開之後，即遭到其後人的多方阻撓，由此亦顯見國家法律與私人隱私，在法律上有諸多的掙扎。

歐處長指出，美國的總統圖書館皆有與 NARA 簽署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或協定（Protocol），有關合作協定是否需要定期簽署？Mark 館長表示，一般而言各別總統圖書館會在編列每年年度經費時與 NARA 及學會商討並簽訂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由於各個總統圖書館需要考量的細節不同，因此並沒有規範固定的簽署年限。

陳頌閔協修提問，大部分美國的總統圖書館與總統故居均位於同一地點，但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與其故居距離較遠，因此請教館方在選址時的考量為何？Rushay 執行長表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曾經考慮過設在杜魯門所經營的農場內部，又或是建立在其童年故居旁。最後因為 1957 年獨立市市長將現址用地上的建物拆除並捐贈予杜魯門總統圖書館作為建館之用。陳協修進一步提問，建館之後如何進行海外史料的徵集？Adams 館長回應，指出大多數的海外史料，均是透過副本典藏入館的方式，尊重原始檔案保存機關。例如口述歷史的錄音檔，國家公園管理局與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均有保存一套。

陳昶安協修提問，1985 年之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檔案徵集情形。Rushay 執行長表示，近期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的徵集重點，一是杜魯門總統家屬所捐贈的私人文書，例如財務報表、銀行往來明細等。二是韓戰退伍軍人的文物及史料大量入藏杜魯門總統圖書館。

最後，陳館長感謝 Adams 館長知無不言的回應及館方同仁的熱情接待，並致贈本館教育推廣品，雙方進行大合照後圓滿結束。



國史館考察團與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座談會後合影

(三) 考察紀要

座談會之後，由導覽志工為考察團導覽。常設展「一個平凡人及其不平凡的旅程」(An Ordinary Man, His Extraordinary Journey)，以線性敘事方式呈現杜魯門如何從一位農場青年到世界領袖的成長歷程，呈現其內外政策決策的歷史背景與個人角色。展覽全位於一樓，連續動線設計有助於觀眾沿著時序理解總統施政與歷史挑戰。



常設展廳一隅

展覽以五大主題館區構成，分別為：「農場到政壇」、「風暴中心」、「戰後世界秩序」、「以色列建國承認」及「民權與忠誠審查」。這些區域利用實物、影音、語音與互動設施，呈現杜魯門在二次大戰末期與冷戰時期的核心政策與價值選擇。茲分述如下：

1、農場到政壇（**Plow to Politics**）：主要描繪杜魯門於密蘇里農場的童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旅經歷。展區以沉浸式場景還原一戰前線，並播放紀實影片，讓觀眾體會其從基層公民走向國家領袖的轉變。該展區亦展出其大學與初任公職時期的文件，凸顯其內心掙扎與公務熱忱。

2、風暴中心（**Eye of the Storm**）：主體敘述杜魯門於 1945 年接任總統後 4 個月所面臨的決策，包括結束二次大戰、波茨坦會議、簽署《聯合國憲章》與核武使用決策。展覽中特別陳列「Fat Man」核彈安全插頭、Sadako Sasaki 摺紙鶴，以及同期照片與訪談，並在牆上標示「反／支持」兩種歷史詮釋，引導觀眾思考核武決策的倫理與政治面向。

3、戰後世界秩序（**Postwar World**）：說明冷戰初期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的建立。展區中設置 14 英尺直徑互動地球儀，搭載多重觸控設備與影音說明，彰顯當時地緣政治的問題與挑戰，引導參觀者自我思辨和平維持策略。

4、承認以色列（**Recognition of Israel**）：透過 1948 年承認以色列這項外交事件，該展區陳列大量的原始公文、私人書信、外交備忘及照片，並以時序圖文形式重建決策脈絡。當中並探討歐戰人道層面與國際實際政治考量，如蘇聯立場與美國選舉政治之交互影響。

5、民權與忠誠審查（**Civil Rights & Loyalty Review**）：聚焦杜魯門於 1948 年頒布《終結軍隊及聯邦機構種族隔離》之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981**），並模擬冷戰時期國內政治環境，開發角色扮演互動遊戲，邀請觀眾對政府信任度機制進行調查評估，以理解自由與安全的衝突。

導覽志工引導國史館考察團至戶外庭園與紀念空間。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擁有明亮的戶外庭園，庭園道路名為「與杜魯門同行」（**Walk with Harry**），讓訪客可以在行走間連接內部展覽內容與外部景觀，深入理解杜魯門生平與對家鄉的情感。庭園串聯展館正門、墓園（含杜魯門夫婦與女兒墓地）、和平廣場。墓園中簡約石碑上刻有杜魯門名言：「我對歷史所追求者，唯真相而已。」（**The truth is all I want for history**），提醒每位考察者反思歷史誠信與公共記憶。墓區亦成為民眾紀念與學術專訪地之一，增進歷史連結。



杜魯門總統夫婦墓園

(四) 館藏檔案史料的調查蒐集

1、館藏檔案簡介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館藏檔案包括白宮核心檔案、白宮僚屬與辦公室檔案、國家安全會議文件、總統秘書檔案等。較為特殊的總統秘書檔案，是杜魯門指示其私人秘書康威保管，包括國家安全情報報告、總統機密通訊、講稿、日程紀錄以及其日記中使用的其他零散文件。以白宮核心檔案為主的杜魯門總統檔案於 1957 年移交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康威保管的檔案則至 1972 年杜魯門去世後才移交，並於 1975 年對外開放。總統秘書檔案分為 23 個系列，以杜魯門總統辦公室文件系列為要，收入政治檔案、函電、主題檔案、韓戰檔案、杜魯門日記及筆記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檔案閱覽室一隅

手稿等。其他重要館藏尚有國務卿艾奇遜官方談話及會議紀錄檔案、波茨坦會議文件、杜魯門總統地圖室文件、口述訪談資料等。

2、蒐集資料標的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所藏白宮核心解密檔案（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Confidential File）、心理戰略委員會檔案（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茲分述如下：

（1）白宮核心解密檔案的時間涵蓋 1938 年至 1953 年，收入杜魯門總統與幕僚間最重要之機密文件，分為主題文件、國務院文件和交叉引用表文件等三個系列。1953 年 1 月杜魯門總統離開白宮時，機密文件與白宮核心檔案的其他部分一起被移轉至密蘇里州堪薩斯市傑克遜郡法院。後杜魯門為撰寫回憶錄需要，下令將機密文件移至堪薩斯市聯邦儲備大樓辦公室，後由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杜魯門辦公室保管，並未包含在杜魯門最初捐贈給政府的總統文件中。1972 年杜魯門去世後，依據其遺囑規定，最終歸政府保管，並於 1976 年開放。



陳儀深館長調查蒐集檔案

本次蒐集標的包括 Korean Emergency、MacArthur, General Douglas [Korean Emergency and Dismissal, 1950-1951]、Correspondence 1949-1953 等子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4 盒。依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Box 18: Korean Emergency [1 of 2]; Korean Emergency [2 of 2]

Box 19: MacArthur, General Douglas [Korean Emergency and Dismissal, 1950-1951]

Box 2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taly, Korea,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etc.]

Box 34: Correspondence, 1949 [3 of 5]; Correspondence, 1949 [4 of 5]; Correspondence, 1949 [5 of 5]; Correspondence, 1950 [1 of 3]; Correspondence, 1950 [2 of 3]

Box 35: Correspondence, 1950 [3 of 3]; Correspondence, 1951 [1 of 3]; Correspondence, 1951 [2 of 3]; Correspondence, 1951 [3 of 3]; Correspondence, 1952 [1 of 5]



檔案閱覽室內閱覽桌及圖書

(2) 心理戰略委員會檔案，時間涵蓋 1951 年至 1953 年，原由中央情報局保管，1980 年移轉至國家檔案館，後依時序劃分為杜魯門及艾森豪政府時期，並存放至相應的總統圖書館。心理戰略委員會於杜魯門總統任內成立，職掌包括制定國家心理戰略政策、評估並推動計畫方案、協調相關部會及組織執行，委員會由國務次卿、國防部副部長及中央情報局局長或其指定的代表組成。蔣經國來臺後掌理政治行動委員會，主持最高情報與治安工作，從事政工改制，美國政府包括心理戰略委員會等對臺觀察評估，為遏制共黨擴張，遂制定專門戰略計畫，與蔣經國互動。本次蒐集標的包括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所藏該全宗編年系列相關文件，共計 5 盒。依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目錄條列如下。

Box 1: Gordon Gray Chronological File; CLASS 000--GENERAL, 1951-1953

Box 2: 014.31 Aliens [immigration laws and policies]; Immigrants; Utilization of Exiles--January 3, 1952; Liaison with the White House--March 19, 1952; Relationship of Statistical Security to Psychological Strategy--December 17, 1952; Executive-Congressional Rela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February 20, 1952; Congressional Relations--Contact with George F. Wilson of Senator Knowland's Staff--January 19, 1952 [and contact with other members of Congress]; Report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rograms [re Government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s]; Centralizing Paramilitary Activity [PSB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ir Force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pport];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McCone report on atomic weapon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quests for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from; access to Library of]; Commerce Department [security clearances of civilian pilots]; Defense Department [coord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1 of 2]; Defense Department [coord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2 of 2];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oordination with; use of Librar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 of, etc.]

Box 3: Mutual Security Agency; Navy Departmen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Officials; PO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State--PSB liaison with; importance of]; State Department; Voice of America; Relationship of Statistical Security to Psychological Strategy; Requests for Graphic Material-- December 11, 1952; Photo Branch Material; Proposal to Make a Series of Films on the General Subject “Why We Fight the Cold War”; Request for Project Progress Chart for PSB

Box 4: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view Group to PSB; Aid for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American Center for Liberation; All American Conference to Combat Communism;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American Legion [coordination with]; Chu Lieu Society [of Hong Kong]; Council Against Communist Aggression; Ford Foundation [William Kennedy Report on ideological warfare; support for escapee program]; Foreign Service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stitute of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d Cross; The Washington Seminar [impact of 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on other nations]

Box 5: Burma; China [refugees;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Formosa

（五）史料舉隅

（一）有關滯留香港的中國難民包括知識分子、學生、技術人員及專業人士備忘錄（約 1951 年）

《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收入數十件心理戰略委員會所進行情報與宣傳及其他心理活動相關檔案史料，包括針對滯留香港的中國知識階級難民所進行調查與援助行動。與此同時，國民黨政權亦由蔣經國等主導以香港為基地策劃敵後行動，與美方形成競合。本次蒐集資料得見心理戰略委員會相關初期評估備忘錄，以下將備忘錄第一部分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The Problem

1. Since the Communist seizure of power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has more than doubled. Over one million refugees have fled into the city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responsible estimates 50,000 of these men and women ar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 professionals, scientists, scholars, academicians, representing every field of knowledge. Included in this number are approximately 3,000 graduates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in Hong Kong.

These people are the core of China’s best-trained and western-oriented leadership. Well over 50% of them are destitute. Almost all live in abysmal conditions. Death from malnutrition is common.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s high.

2. The American trade embargo, coupled with the unprecedented influx of refugees from the Communist mainland, have placed Hong Kong in the midst of a major economic crisis. There is not enough work for even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refugees. The educated class suffers the most from this situation. They are almost always physically unequipped to compete with the hordes of refugees for the few jobs at manual labor that are available.

3. The attempts to erect adequate housing to meet the already existing shortages of dwelling units as of V-J Day have proven entirely insufficient. The rapid rise of population overwhelmed all accommodations. This resulted in a meteoric rise in rents and inhuman crowding in middle-class and poorer quarters.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s refugees live as squatters in nothing better than improvised huts made of clapboard without any sanitary facilities. Only a few months ago the biggest fire in Hong Kong’s history wiped out several thousand of these huts, leaving more than 20,000 human beings homeless and completely destitute.

4. Hong Kong food prices have jumped sharply. If a man is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work he discovers that the salary he receives is too low to provide even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food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pproximately 90% of all refugees in this group of 50,000 have families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them. With the high price of food (see Appendix A) and the low salari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even to approach proper subsistence.

5. As was stated previously, approximately 3,000 of the intellectual refugees in Hong Kong are graduat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see Appendix B). Sixty-nine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known to have alumni liv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see Appendix C). A poll was taken of 96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Hong Kong which reveals the impossibl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n and women, many of them world-renowned, are forced to exist (see Appendix D). According to Dr. C. T. We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Club, no full-scale survey among the refugees in Hong Kong dare be made at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of the grave danger of raising false hopes among the destitute professionals that help is being organized.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random survey was made among American-trained professionals. Thos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American training are, for the main, in even worse circumstances.

6. This situation has created disillusionment and cynicism with the Free World.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s have finally given up and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to give their talents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see Appendix E). The Lao government is smart enough to make good use of both the psychological disillusionment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returnees. The Hong Kong situation also has a serious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now in this country who will someday return to their homes in China.

7. The two seemingly logical places for the resettlement of many of the intellectual refugees are largely closed off. Migration of additional Chinese to Formosa is not fav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over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ese already existing on that island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difficulties. Japan is faced with a similar problem. There is not enough work for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 Japan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on University, which will open in February, 1952, can employ at the most two or three from the group in Hong Kong.

「問題

1. 自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以來，香港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過去兩年來，已有超過一百萬難民逃入該市。根據可靠估計，其中有 5 萬名知識分子，包括專業人士、科學家、學者、院士，代表了各個知識領域。根據香港美國大學俱樂部的調查，其中包括約 3 千名美國大學畢業生。

這些人是中國訓練有素、西化程度最高的領導階層的核心。其中超過 50% 的人處於赤貧狀態。幾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中。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情況很常見。自殺發生率很高。

2. 美國的貿易禁運，加上共產黨大陸的難民空前湧入，使香港陷入了重大的經濟危機，甚至沒有足夠工作給一小部分難民。受過教育的階層受這種狀況的影響最為嚴重。他們的身體素質幾乎總是不足以與大批難民競爭少數的體力勞動職位。

3. 自對日作戰勝利以來，為解決已經存在的住房短缺問題而建造足夠住房的嘗試已被證明是遠遠不夠的。人口的快速增長使所有住房不堪重負。這導致租金飛漲，中產階級和貧困人口居住區變得異常擁擠。數十萬難民居住在臨時搭建的木板屋中，沒有任何衛生設施。就在幾個月前，香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火災燒毀了數千間這樣的小屋，導致超過 2 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

4. 香港食物價格大幅上漲。一個人即便幸運地找到工作，工資亦太低，甚至無法滿足他自己和家人的最低食物需求。在這 5 萬名難民中，約有 90% 的家人完全依賴他們。由於食物價格高昂（見附錄 A）且工資低廉，幾乎不可能維持正常的生活。

5. 如前所述，香港的知識分子難民中約有 3 千人是美國大學的畢業生（見附錄 B）。

據了解，有 69 所美國大學校友生活在這種條件下（見附錄 C）。對香港美國大學俱樂部 96 名成員進行的民意調查揭示了男女如何在這種不可能的條件下被迫生存，其中許多是世界知名人士（見附錄 D）。據前中國駐美國大使、大學俱樂部主席王正廷博士稱，目前不敢對香港難民進行全面調查，因為這可能會給正在組織援助貧困專業人士帶來不切實際的希望。重要的是要記住，這項隨機調查是在美國接受培訓的專業人士中進行的。那些沒有機會接受美國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處境大多更糟。

6. 這種情況導致人們對自由世界產生幻滅而感到憤世嫉俗。有些知識分子最後放棄了，回到大陸，為共產黨政權貢獻自己的才華（見附錄 E）。察國政府非常聰明，既能利用返國人員的心理幻滅感，又能利用他們的能力。香港局勢也對目前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他們日後會回到中國家鄉。

7. 兩個看似適合安置眾多知識分子難民的合理地點，大部分都被封鎖了。由於臺灣島上中國大陸人口過剩，導致經濟困難，美國政府不贊成更多中國人移民到臺灣。日本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日本知識分子的工作機會不夠。1952 年 2 月開辦的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頂多只能從香港聘用二至三人。」

（Source: Truman Library,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 Box 5）

（二）美國學者戴德華訪臺見聞報告（1952 年 5 月 29 日）

戴德華（George E. Taylor, 1905-2000），生於英格蘭，後歸化美籍，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早年獲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獎助，赴北平從事太平天國研究。曾任教於中央政治學校、燕京大學，返美後任華盛頓大學東方研究系主任，二次大戰時期任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副局長，負責太平洋地區事務。戰後自 1946 年起任華盛頓大學遠東暨俄羅斯研究所所長，長達 20 餘年，對美國漢學界、區域研究學界頗具影響力。

本次蒐集資料得見戴德華受杜魯門政府心理戰略委員會所託，就訪問東亞尤其是臺灣見聞，以及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思想在亞洲蔓延的對策，所提出非正式報告。報告對象可能是委員會主席格雷（Gordon Gray）或負責審查委員會所擬計畫方案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別顧問傑克遜（William H. Jackson）。以下將臺灣相關段落全文照錄並中譯之：

“My most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at a great deal has to be done to spread information about communism among the literate classes, especially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most Asiatic countries. The isol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ost countries is pretty obvious. The U.N. and other agencies are doing something to break it down but we need a typhoon not a gentle wind. The bilateral approach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 exchanging persons only with the States, does not harm but it does not take care of the very much greater problem of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Filipino, Burmese etc. etc. We badly need to hav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me to Formosa and Chinese go to Japan, to have Chinese go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etc.

In this way there can be spread around some of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of communism and other problems and there might develop the intellectual basis for some real cooperation. The Japanese need close contact with Chinese who have lived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Chinese need the stimulation of other points of view and the moral strength that comes of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facing similar problems of engaged in the same profession.

The exchange of persons between Asiatic countrie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a vast publication program. The communists dominated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they are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Japan.

Books and pamphlets by the million should be flooding the bookstore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New Delhi, etc. They should be in every possible language. Our dear old State Department is so limited either by itself or congress that they cannot buy Toynbee's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for the library, even the American edition. Just American culture. One concrete proposal is to ask the Americ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 to waive copyright on All American books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 let us go ahead and translate out here without having to go through the lengthy process of clearance. This could be a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They never collect on copyright here anyway. But the main thing is to get something moving on a big scal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lan.

The exchange of persons is not very useful if it is not done in some sort of meaningful way - the exchanges that could develop out of a tremendous publishing project in Asia could be very useful indeed. The dearth of books on

Taiwan is striking - we need a vast translation program of all sorts of books right away. Sherwood's book on Roosevelt and Hopkins would be as good an illustration of the way our government operates as anything I can think of - but there should be dozens and dozens - Lives of Abraham Lincoln, books on the civil war, studies of the New Deal biographies etc. - all the real stuff about America, not the carefully selected aseptic list which finds its way into our USIS libraries. There is great hunger here as in Japan for the facts about Americ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general. Its all right to concentrate on America if you supplement with Europe too. The law will not permit it but it would be very wise occasionally to bring here not an American but a distinguished European who has been to America and knows enough to talk sense.

These are random comments on the exchange of persons. The State Dept has a plan by which it goes in this business but the boys back home certainly foul things up. They refused to consider inviting Chiang Ching-kuo, the Generalissimo's son and the Crown Prince, when requested from the field, for perfectly stupid reasons. He was educated in Russia and desperately needs to have his view of life broadened. Several people think that the section of State which handles these things back hom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y do some strange things.

Premier Chen Cheng agrees that Land Re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ings out here. He understands that land reform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dustrialisation. He was rather critical of a recent article by Drucker in Harpers in which industrialisation is apparently presented as the key to Asia's troubles. I discussed with him the idea of hav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d Reform somewhere in Asia. He offered a welcome to Formosa. But if we are to get India into the picture Formosa would not do. Manila might - or some cooler place in the Philippines.

Such a conference should be on a fairly high level. It might be accompanied by other side-lines - studies of communism on a comparative basis. He agreed to this too.

This would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together all sorts of peopl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get some cross-fertilisation going on the political level. Those countries are going to find it hard to get over old wounds so I think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Load in finding all sorts of constructive ways and means of getting contact established in a constructive way. Maybe the conference should not be on Land Reform but rather on something technical - Land utilisation for example - and let land reform come on to the agenda in a natural and functional manner. There is no question but that the objectives of Land reform - social

stability and increased production - have to be achieved in different way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 conference would do a great deal to break down the dogmatic position which many tend to take on land reform and draw attention to the objectives.

Our present policy position as regards Formosa is that we are determined to stop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Soviet power and have included Formosa in the area which we will not see gobbled up. The question of a return to mainland is one that arises for us only if our vital interests are further endangered and a general war opens up-in that case it is possible that we might want to assis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Whatever the future we are interested therefore in the political complex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gime. First I would suggest that we avoid the phrase and the intention to make of Formosa the showpiece of democracy in Asia. This sets our sights too high, it brings out our congenial reformist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ds to a disproportionate loss of prestige if the objective is not achieved. If the place ever became democratic we should call it by that name long after the facts are apparent.

Formosa has a large bureaucracy and is bound to have one. The government is the largest landowner, industrialist, exporter and importer, and the largest employer. The problem therefore is not one of private enterprise versus public enterprise, but of a ruling bureaucracy and a controlled bureaucracy. Until that problem is decided all others are academic. Now there is already developed a certain measure of control over the bureaucracy. This control is exerci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fficials come before it, the budget has to be passed, committees made investigations. All this is new and comes unfortunately at a time when the Legislative Yuan cut off from its constituencies. But it provides the only concrete and possibly dynamic element in the situation that we can do anything about. Without giving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kiss of death we can give it moral support and make it clear that we would be very shocked if it were pushed around. I have talked this over with Mr. Jones of our embassy here and find him in strong agreement. He is go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e thing that everyone in the upper brackets of the embassy here agrees upon is the need for an ambassador. We ought to have a man who has some sta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also 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who is able to coordinate the many agencies we have out here and see that their efforts are directed towards the best interests of American policy. The embassy is understaffed. It tends to be dominated by the large money spending groups like the M.S.A. and M.A.A.G. If we do not have a strong political direction in Formosa 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free-wheeling little Napoleons and economic

tzars runn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is is a general problem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field - it is particularly acute in Formosa.

The problem is all the more acute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th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getting the Chinese army back on its feet and the success of the J.C.R.R. and M.S.A. in gett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covery going so well. The protection of Formosa by the seventh fleet combined with military and economic progress has tended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ome of the old mossbacks are coming out again and would like to take over. This year is likely therefore to be of great importance politically. We need now to do a little strong political thinking about our impact on Formosa and see to it that we are strengthening rather than weakening the trend towards more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chastening effect of defeat is not going to disappear overnight but removal of the sword of Damocles gives more opportunity for conservative counsel.

This is about all I can get down at the present moment. It is disorderly and there is not much you can do about it but perhaps it might be useful for background. When I have had a chance to let things sink in a little more I hope to come up with some formulations which might be more useful.

George E. Taylor

Please treat this as confidential.”

「我最普遍的結論是，在大多數亞洲國家，需要做大量工作來在知識階層，特別是學生和教師中，傳送有關共產主義的資訊。大多數國家知識分子的孤立是相當明顯的。聯合國和其他機構正採取措施來化解這場危機，但我們需要颳起颱風，而不是微風。美國國務院採取雙邊方式，即只與美方人員交流，雖然沒有造成損害，但卻沒有解決華人、日本人、菲律賓人、緬甸人等之間的更大接觸問題。我們迫切需要日本知識分子來到臺灣，中國人去日本或東南亞各地等等。

如此即可傳播關於共產主義和其他問題所累積的知識，並可能為真正的合作奠定思想基礎。日本人需要與在中共統治下生活的中國人密切接觸，中國人則需要其他觀點的刺激以及與面臨類似問題或從事相同職業的人交往所產生的道德力量。

亞洲國家之間的人員交流應輔以廣泛的出版計畫。共產黨多年來一直主宰著中國的出版業，在日本也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數以百萬計的書籍和小冊子應該充斥香港、新加坡、新德里等地的書店，並以各種可能的語言出版。我們親愛的老國務院無論是受到自身還是國會的限制，都無法為圖書館購買湯恩比的《文明史》，即使是美國版。即使只是美國文化。一個具體的建議是要求美國出版商協會放棄所有美國書籍在中國的版權——讓我們繼續翻譯，而不必經過漫長的審核過程。這可能對戰爭努力有所貢獻。

無論如何，這裡從不收取版權費。但最主要的還是要大規模地按照計畫進行。

如果沒有以某種有意義的方式進行，人員交流就不會有太大用處——但在亞洲開展一項大型出版計畫所能發展的交流，確實可能非常有用。有關臺灣的書籍的匱乏令人震驚——我們需要立即開展各類書籍的大規模翻譯計畫。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傳記作家〕的《羅斯福與霍普金斯》是我能想到的最好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政府是如何運作的——但應該有數十種——林肯生平、關於內戰的書籍、新政人物研究等等——所有關於美國的真实內容，而不是精心挑選的、進入我們美國新聞處圖書館的無菌清單。和日本一樣，這裡的人們也渴望了解關於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事實。如果同時以歐洲作為補充，那麼專注於美國也是可以的。法律不允許這樣做，但有時帶一位去過美國、懂得足夠道理的傑出歐洲人駐臺，而不是美國人，會非常明智。

對於人員交流的評論是存在的。國務院對這項業務有所計畫，但國內有人肯定把事情搞砸了。當蔣經國——蔣委員長的兒子兼太子——被現地要求邀請時，他們拒絕考慮，理由十分愚蠢。他在俄國受教育，迫切需要拓寬他的人生觀。有人認為，應該對處理這些事情的國務院部門進行調查。他們做了些奇怪的事。

行政院長陳誠同意土地改革是當前最重要的事。他明白，改革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他對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最近在《哈潑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評，該文顯然將工業化描述為亞洲麻煩問題的關鍵。我和他討論了在亞洲某個地方召開土地改革國際會議的想法。他對大家來到臺灣表示歡迎。但如果我們要把印度納入考慮範圍，臺灣就不這麼做。馬尼拉也許可以——或者菲律賓更涼爽處。

這樣的會議應該是有相當高水準的。它可能伴隨其他主題——基於比較的共產主義研究。他對此也表示同意。

這將使我們有機會將來自不同國家的各類人士聚集在一起，並在政治層面上進行相互交流。這些國家將會發現很難克服過往傷痕，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承擔責任，尋找各種建設性的方法和手段，以建設性的方式建立連結。也許會議不應該討論土地改革，而應該討論一些技術性問題，例如土地利用，並讓土地改革以自然和實用的方式提上議程。毫無疑問，土地改革的目標——社會穩定和提高產量——在不同的國家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實現。會議將大大打破許多人對土地改革所持有的教條主義立場，並引起人們對土地改革目標的關注。

我們目前對臺灣的政策立場是，我們決心阻止蘇聯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並已將臺灣納入我們不會眼睜睜看著它被吞併的地區。只有當我們的切身利益進一步受到威脅，並且爆發了全面戰爭時，我們才會考慮重返中國大陸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去協助國民政府收復大陸。因此，

無論未來如何，我們都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面貌感興趣。首先，我建議我們避免使用「將臺灣打造為亞洲民主典範」這樣的措詞和意圖。這使我們的目標過高，暴露了我們先天的改革派特徵，如果目標沒有實現，就會導致威望的極大損失。如果這個地方真的實現了民主，我們應該在事實明朗之後再用這個名詞來稱呼它。

臺灣的官僚組織龐大，而且必然如此。政府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工業家、出口商與進口商，以及最大的雇主。因此，問題不在於私人企業與公共企業之間的矛盾，而是統治官僚機構與受控制官僚機構之間的矛盾。在該問題解決之前，其他所有問題都只是學術問題。現在對官僚機構的控制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此項控制權由立法院行使。官員們來到立法院，預算必須通過，委員會必須進行調查。這一切都是新的，不幸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立法院與選區斷絕聯繫的時期。但它提供了我們能夠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唯一具體的、可能動態的元素。我們不必給立法院致命一擊，而是給予它道義上的支持，並明確表示，如果它被操弄，我們會感到非常震驚。我與我國駐華大使館的瓊斯先生〔Howard P. Jones，大使館參事〕討論過這個問題，發現他十分同意。他要對此採取措施。

這裡大使館高層人士一致認為需要派遣一名大使。我們應該選一個在美國有一定地位、也能被中國人接受的人，以便協調我們在這裡設立的眾多機構，並確保他們的努力符合美國政策的最佳利益。大使館人手不足。它往往受到共同安全總署及軍事顧問團等大量開銷的機構主導。如果現在我們在臺灣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方向，我們就會面臨隨心所欲的野心家和朝著不同方向奔跑的經濟官員。這是政策執行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在臺灣尤為突出。

由於軍事顧問團成功地幫助中國軍隊重新站起來，以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及共同安全總署成功使農工業復甦進展順利，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第七艦隊對臺灣的保護，加上軍事和經濟的進步，已經逐漸改變國民黨政府內部政治勢力的平衡。若干守舊派又重新出現，並想要接管政權。因此，今年在政治上可能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現在需要對我們對臺灣的影響進行深刻的政治思考，並確保我們正加強而不是削弱更負責任的政府和法治的趨勢。對匱乏的警戒心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但時刻存在的危機一旦消失，便為守舊派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這就是我目前所能記下的全部內容。報告是無序的，對此您恐怕無能為力，但可能對理解整體背景有用。當我有機會進一步思考這些事情時，我希望能想出若干可能更有用的方程式。

戴德華

請將此報告列入保密。」

(Source: Truman Library,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 Box 5)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暨紀念碑

4月26日上午，國史館考察團在堪薩斯臺灣同鄉會楊英育夫婦的陪同下，前往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The National World War I Museum and Memorial）。

（一）機構介紹

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位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是美國專門致力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研究與教育的國家級博物館。因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及當地社區希望建立一處紀念場所，以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美軍士兵。隨著時間發展，這一理念逐漸擴展為集教育、研究與文化保存於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旨在促進公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理解與反思，揭示戰爭如何影響全球政治、社會結構及科技發展。同時，博物館強調和平的重要性，借鑒歷史經驗，呼籲當代社會避免重蹈覆轍。博物館占地廣闊，設有歷史紀念碑、多媒體展示區、教育中心及檔案庫，是全球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重要機構。



國史館考察團與楊英育夫婦（右1、2）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前合影

(二) 主要館藏與當期展覽

博物館收藏超過 100 萬件文物史料，內容涵蓋軍事裝備、士兵日記、信件、照片、宣傳海報及影音資料等。這些珍貴的資源不僅來自美國國內，亦包括歐洲及其他參戰國家，為研究提供多角度、多層面的視野。展覽區域分為多個主題，包括戰爭起因、戰場實況、科技革新、外交談判、戰後影響等。館內使用互動式多媒體展示，結合音效、影像及模擬場景，使參觀者沉浸於歷史的情境之中，加深對戰爭複雜性的理解。此外，博物館的紀念碑「自由之塔」(Liberty Memorial Tower) 高達 102 米，成為堪薩斯市的地標，象徵自由與和平的永恆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推出的當期展覽為「戰火中的女性」(Women in the Fires of War)。該展覽旨在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在戰場後方及前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其對戰後女性權利運動的深遠影響。展覽內容涵蓋多個層面：

1、女性在軍事與後勤支持中的角色：該部分介紹女性作為護士、通訊員、工廠工人及間諜等職務，對戰爭機制的貢獻。展出大量當時女性穿戴的制服、醫療器械及個人物品，並展示女性如何突破傳統性別界限，參與本被視為男性專屬的軍事行動。

2、女性參與的社會與政治變革：透過文獻與影像資料，描繪戰爭如何催化女性參政權的推動，特別是在英國、美國及法國等國。戰爭期間女性的社會地位有所提升，為 1920 年代取得選舉權奠定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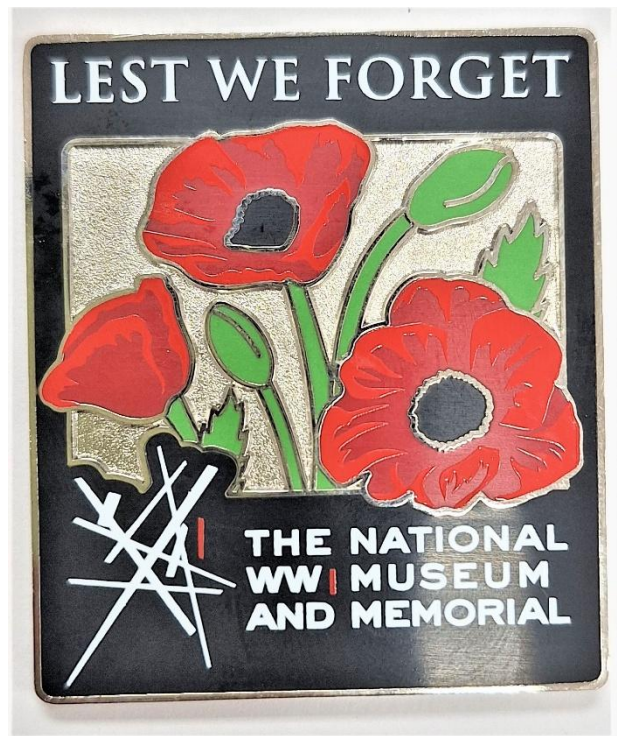
3、戰爭期間女性的日常生活與挑戰：利用日記、信件和口述歷史，還原女性在戰爭期間的生活困境與心理掙扎，展現她們的堅韌與勇氣。同時亦關注戰爭對家庭結構與性別角色的影響。

4、跨國視野下的女性故事：展覽特別引入多個參戰國女性的故事，包括歐洲、美洲及亞洲的女性，藉以呈現不同文化與戰爭背景下女性的多樣經驗。

5. 互動體驗區：設置虛擬實境（VR）與互動投影，讓參觀者扮演女性戰地護士、工廠工人等角色，感受當時的工作與環境壓力，增強歷史同理心。

「戰火中的女性」展覽不僅豐富了公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認識，也促使學界重新審視性別史與戰爭史的領域。透過女性的視角來探討戰爭，有助於糾正以往戰爭史中以男性為中心的偏差，促進更全面的歷史理解。該展覽也指出社會對當代性別平等問題的反思，強調女性在歷史與現代社會中的多重角色與價值。博物館也配合展覽舉辦學術研討會、教育講座與社區活動，促進學術交流與社會參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不僅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資產，更透過精心策劃的展覽和教育活動，促使公眾深入了解這場改變全球歷史進程的戰爭。當期展覽「戰火中的女性」以獨特的性別視角補充了傳統戰爭史的不足，提升了歷史的多元性與包容性。



該館標語，提醒大眾莫忘歷史



博物館展場

四、「臺灣轉型正義 ABC：歷史與未來」座談會

4月27日下午14時，國史館考察團參加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主辦之「臺灣轉型正義 ABC：歷史與未來」座談會，陳儀深館長也應邀在西雅圖華僑文教中心發表〈研究二二八的核心價值〉演講。

(一) 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簡介

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Taiwan Studies Program, UW Taiwan Studies）成立於2017年，是北美少數以臺灣為專門研究對象的跨學科學術平臺之一。該研究計畫隸屬於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旨在提升臺灣在全球學術界的能見度與知識生產。其接受多方的支持，包括 UW 本校提供基礎經費，以及來自臺灣教育部的補助（2018-2020年）。自2023年起，也接受外交部的補助，另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研究專案，共建臺灣資料網路，整合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學科，強調跨領域、跨區域研究的重要性。



華盛頓大學校園一景

該研究計畫自設「臺灣研究講座系列」，每學期舉辦6-8次國際及本土學者演講與工作坊，2025年已邀請包括王景弘教授談國際外交、張玲教授談文化認同、吳信榮博士談世代世紀論題。同時，每年4月圍繞228、白色恐怖與原住民族等議題舉辦座談，結合當地臺灣學生與校友公眾參與，實踐知識普及。

(二) 座談會紀實

陳館長首先敘述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價值是人權關懷與國族建構，以及在1990年代進行二二八研究的心路歷程。早期赴美研究蒐集資料，在史丹佛大學抄錄《蔣介石日記》，蔣介石在日記中揭示了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和善後處置，包括派兵鎮壓和對陳儀的保護。閩臺監察使楊亮功在《「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的報告中描述了二二八事件的查辦過程，以及官方後續的搜捕行動。監察委員丘念臺的意見書則反映了對二二八事件的良心話與建議。

陳館長接著提到，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著作《被出賣的臺灣》對臺獨運動影響深遠。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的副領事，在該書

中記錄了事件發生前後對臺灣的觀察。該書原以英文出版，海外完成的中譯本 1991 年才由國內的前衛出版社出版，之後幾經修訂，由臺灣教授協會在 2014 年重譯註校出版。早期葛超智的書籍與文章在海外流傳，為出國留學的臺灣人所接觸。例如著名的 3F，即臺灣人的自由臺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成員盧主義在閱讀葛超智的著作後，即受到其啟蒙。而國民黨政府也注意到該書的出版並試圖駁斥。

在二二八事件後，廖文毅曾提出比較系統性的臺獨理論，強調臺灣人與中國人之不同、開羅會議是國際間的武斷，中國政府因二二八事件而失去統治臺灣的正當性。王育德則認為臺灣民族實質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後。但到了 1970 年代，受過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臺灣青年」，對於民族（nation）、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理解，有別於廖文毅那一代，比較偏重主觀要素（認同）。依照黃昭堂先生的說法：「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時來臺，凡是認同臺灣的，都是臺灣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臺獨運動接受了居住在臺灣，並認同臺灣的大陸系人。

美國的臺灣同鄉或留學生，不論從個人親身經歷，或是從葛超智的著作中體會到故鄉被壓迫的悲劇，常是付諸反抗行動的力量泉源。臺獨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包括鄭自才、王幸男等人，他們在美國留學期間受到葛超智書籍的影響，政治意識萌芽。臺獨運動的重心亦從日本轉移到美國，UFAI（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在全美各大學刊登二二八事件紀念廣告，展現了臺獨聯盟的動員力量。最後陳館長提到，今時今日除了要追憶過去，更要展望未來，讓轉型正義能在臺灣實現，才能形成團結的命運共同體。

五、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一）機構介紹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簡稱 UW）創立於 1861 年，是美國西岸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之一。校本部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中心附近，另設有塔科馬（Tacoma）、波塞爾（Bothell）兩個分校區。其在科研、醫療、工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領域均享有盛譽。UW 校園環境優美，設施完備，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優秀學生與學者，亦是多項大型科研項目的主導者，涵蓋基礎科學、醫藥創新、環境科學、社會政策等方面。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入口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East Asia Library，簡稱 EAL）是北美最具規模的東亞圖書館之一，隸屬於 UW 圖書館系統。該館藏書豐富，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等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學、哲學、社會科學等多方面資料。EAL 自 20 世紀初期成立以來，持續擴充館藏，致力於支持大學教學與研究需求。圖書館擁有先進的數位資源和傳統的紙本文獻，為東亞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基礎。

（二）館藏臺灣資料情況

1、館藏範圍與類型

東亞圖書館對臺灣資料的收藏，涵蓋歷史文獻、政府公報、報紙雜誌、學術期刊、文化作品、口述歷史等多種形式。這些資料來自臺灣各大學、政府機關及文化機構，時間涵蓋清末至現代。館藏類型豐富，既有中文原文資料，也包含英語及其他語言的研究著作。部分館藏為第一手資料，如珍貴手稿、照片、官方檔案及政治宣傳資料，為研究臺灣政治、社會變遷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2、歷史文獻與檔案

EAL 收藏有大量涉及臺灣歷史的原始檔案，尤其是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官方文件與研究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於學者深入了解臺灣在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戰後政府公報及法規資料的收藏，則提供了臺灣政治體制、法律演變的詳細記錄，對研究臺灣民主化進程及社會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3、報刊與期刊

館內收錄有大量的臺灣報紙、雜誌及學術期刊，如《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主要報刊，這些資料有助於理解臺灣社會輿論、生態以及政治動態。而學術期刊涵蓋臺灣各學科之先行研究，支持多領域學者的學術創作與引用。

4、藝術與文學作品

EAL 同時收藏有豐富的臺灣文學與藝術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及視覺藝術出版物，反映臺灣文化的多元面貌，是理解臺灣文化認同與文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5、數位資源與遠程訪問

為因應現代學術研究需求，EAL 積極建設數位典藏，部分臺灣資料已數位化，提供遠程訪問與數據分析功能，促進全球學者的使用便利。



圖書館內典藏多套國史館出版品。

(三) 考察紀要



張雅倫（Ellen Chang）講師（右 1）接待國史館考察團



東亞圖書館內一景

4月28日下午，考察團前往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由該校張雅倫講師（Ellen Chang）接待考察，並參觀館內「歷史的迴響、記憶的呼喚：二二八事件特展」，以及東亞圖書館的書庫。該特展係由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計畫主辦，設置於圖書館內，展出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紀錄與研究，以及相關的藝文創作，例如播放電影《超級大國民》、《天馬茶房》。圖書館內亦設有中華民國研究專區，在書庫內收藏有多套本館出版品，包括《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一）、（二）》、《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一）-（六）》、《蔣經國日記 1970-

1979》、《宗像隆幸與彭明敏往來書信集》、《楊西崑先生訪談錄》等。透過特展與多項的出版品，將能提供更多的資訊，使世界能瞭解戰後臺灣的歷史與社會發展脈絡。



華盛頓大學蘇薩羅圖書館
Suzzallo Libraries

肆、考察心得

一、檔案史料管理部分

(一) 政府資訊公開、資料開放透明。NARA 所轄各總統圖書館均有提供公開查詢服務，並動態建置數位檔案目錄（如 Archives.gov）。研究者可透過線上或現場申請閱覽紀錄、公文、照片與影音資料。實務上，許多館別每年皆服務數千至上萬人次的學術查閱需求，程序便捷，並有專業館員提供協助。

(二) 多元保存技術與數位轉型。賡續推動史料數位化，包括公文、電子郵件、錄音、影片與實體物件等，並透過數位平臺對外開放。

(三) 歷史學、檔案學研究人員之錄用，著重其專業能力及工作經驗，部分來自國家公務員考試，部分為約聘僱人員，採取彈性的用人策略。

二、總統圖書館部分

(一) 法律制度面向，臺灣可仿效美國制定《總統圖書館法》與《總統紀錄法》，並修正《檔案法》，使總統檔案與文物的保存、管理及研究得有法律依據。

(二) 功能整合規劃，結合檔案典藏與公共展覽，設置教育推廣中心、互動式展覽，增進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總統圖書館典藏的內容除了該位總統之檔案文物，尚可包括其任內主要部屬之檔案文件，如麥克阿瑟（杜魯門總統）、杜勒斯（艾森豪總統）等。

(三) 檔案、展覽、教育三位一體。美國總統圖書館集檔案典藏、公共展覽與教育資源於一體。例如杜魯門總統圖書館有常設展、互動體驗、研究室與庭園紀念空間；艾森豪總統圖書館亦結合家鄉營造與教育中心。選址結合總統故鄉、故居，推動地方文化連結與國家民族意識，作為普及史料與提升公民素養之平臺。

三、研究交流分享

(一) 蒐集總統圖書館典藏之相關檔案史料，進行重要歷史專題之研究，例如《舊金山和約》、韓戰等，開展新史料、新觀點。

(二)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分享二二八、臺灣地位、冷戰等研究之心路歷程及重要心得，提升中華民國史、臺灣史研究的能見度。

伍、建議事項

一、加強與總統圖書館、大學或學術研究機關的互動交流

本館與杜魯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及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商談建立學術交流與合作，透過數位資料庫與服務平臺，拓展館際合作與交流。

二、規劃成立歷任總統圖書館隸屬於國史館

國史館典藏大量的總統副總統文物，且是《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之主管機關，包括自 2003 起出版蔣介石事略稿本、陳誠日記史料彙編、李登輝口述歷史等一系列總統副總統的研究編纂。近年來亦積極蒐集李前總統生涯事蹟相關資料、編輯出版《李登輝先生大事長編》、《李登輝總統僚屬故舊訪談錄》、《陳水扁總統訪談錄》，並建置「歷任總統資料庫」等工作，可說是目前國內總統副總統相關典藏、研究編纂最多的政府機關，不管是規劃在國史館下成立歷任總統圖書館，或國史館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均已具備相當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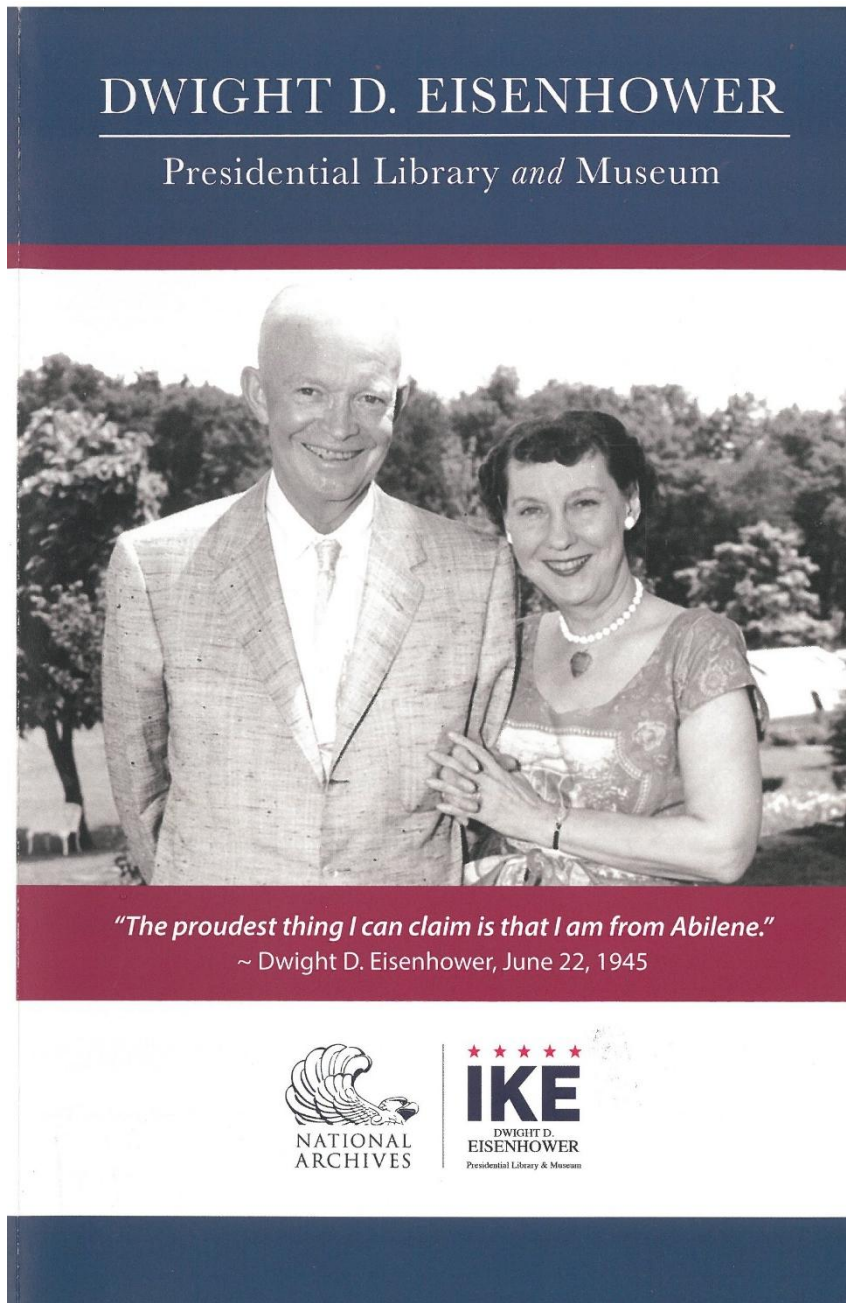
三、建立以中華民國臺灣為主體之歷史教育、歷史研究

國史編纂與一般歷史研究不同。吾人認為，國史的範圍係以今臺灣生活共同體的地理空間所發生的歷史及各族群的歷史經驗所共同構成，其歷史經驗包括事實上統治臺灣的各個統治政權。建議本館館務重心與成果，圍繞著以中華民國臺灣為主體的多元族群觀點，從國家發展的角度，記錄發展歷程、形塑國家認同、凝聚全民共識。

陸、參考資料

一、艾森豪總統圖書館相關資料

(一) 摺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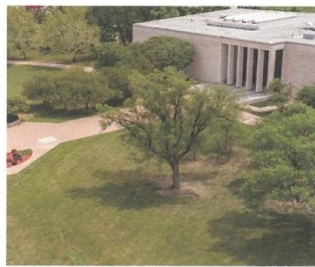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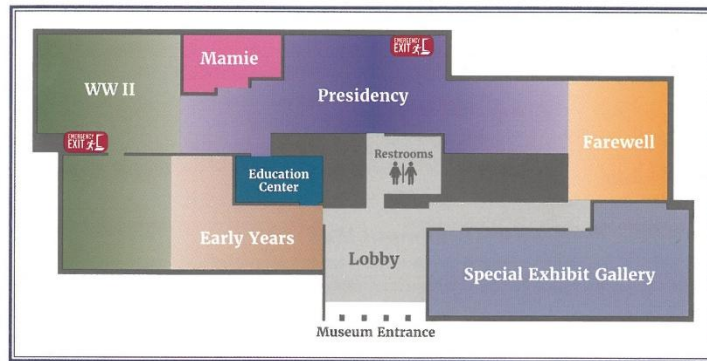


Museum: Tickets | Exhibits
(Admission ticket required)



Using Ike and Mamie's own words, the all-new exhibits are complete with new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components. Examine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artifacts and documents that reveal Dwight's remarkable life. Follow Mamie as she becomes Ike's life partner and they venture on "their career." Hear Ike's voice on issues ranging from D-Day to world peace in the new mini-theaters. Finally, reflect on Ike's lifetime of public service and his legacy for the future.

Museum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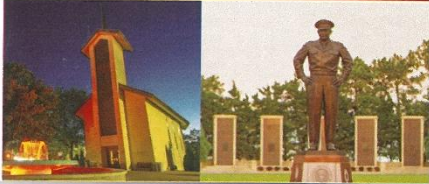
Limited schedule?





This is how much time you need.

- Orientation film: 24 minutes
- Home tour: 15–20 minutes
- Exhibits: 1–4 hours
- Photo ops: 15 minutes
- Burial site: 15 minutes
- Souvenir shopping: Take as long as you would like—we don't mind.
- Research: 2 hour minimum

(二) 門票票根

www.eisenhowerlibrary.gov

@IkeLibrary    

200 SE 4th Street | (785) 263-6700
Abilene, Kansas | (877) RING-IKE

FREE MUSEUM ADMISSION • VALID THRU:12/31/2025

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相關資料

摺頁

MUSEUM STORE

The Buck Stops Here! Store features items related to President Truman and his legacy and other locally sourced mementos inspired by his connection to America's Heartland. Located in Grandview Hall, there is no admission fee to shop in the store. You may also contact the store by phone at 816.268.8267, or shop online at www.trumanlibrary.gov.

MEMBERSHIP

Truman Library Institute members enjoy free Museum admission at the Truman Library and *all* Presidential Libraries operat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nual memberships start at just \$35. Inquire at the Admissions Desk, or visit TrumanLibraryInstitute.org/JOIN.



RESTROOMS

Restrooms are located on the main level near the Admissions Desk (to the left of the Museum Exhibit entrance) and on the lower level next to the stairs.



ELEVATOR

An elevator is located to the right of the Oval Office.

STAIRS

Stairs are located to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 Oval Office.

ACCESSIBILITY

Wheelchairs and descriptive Audio/Visual transcripts are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Please see a staff member at the Admissions Desk for assistance.

LOST AND FOUND

To inquire about missing items, please visit the Admissions Desk, call locally at 816.268.8267, or call the Museum's toll-free number at 800.833.1225.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MUSEUM

500 West U.S. Highway 24 ★ Independence, Missouri 64050
816.268.8200 ★ 800.833.1225 ★ www.trumanlibrary.gov

MUSEUM GUI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MUSEUM

TICS

was a farmer, haberdasher, before he went U.S. Senator. is past him to

JR of the ecisions

: defined months

II of d in ns for much of uins, the sm, and a an economy.

OF ISRAEL

of close advisors opinion, President s own instincts when he State of Israel in what he the "proudest moments" of

CIVIL RIGHTS Among his landmark ating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Federal rce by Executive order were among many ent Truman's pursuit of a "Fair Deal" for all Americ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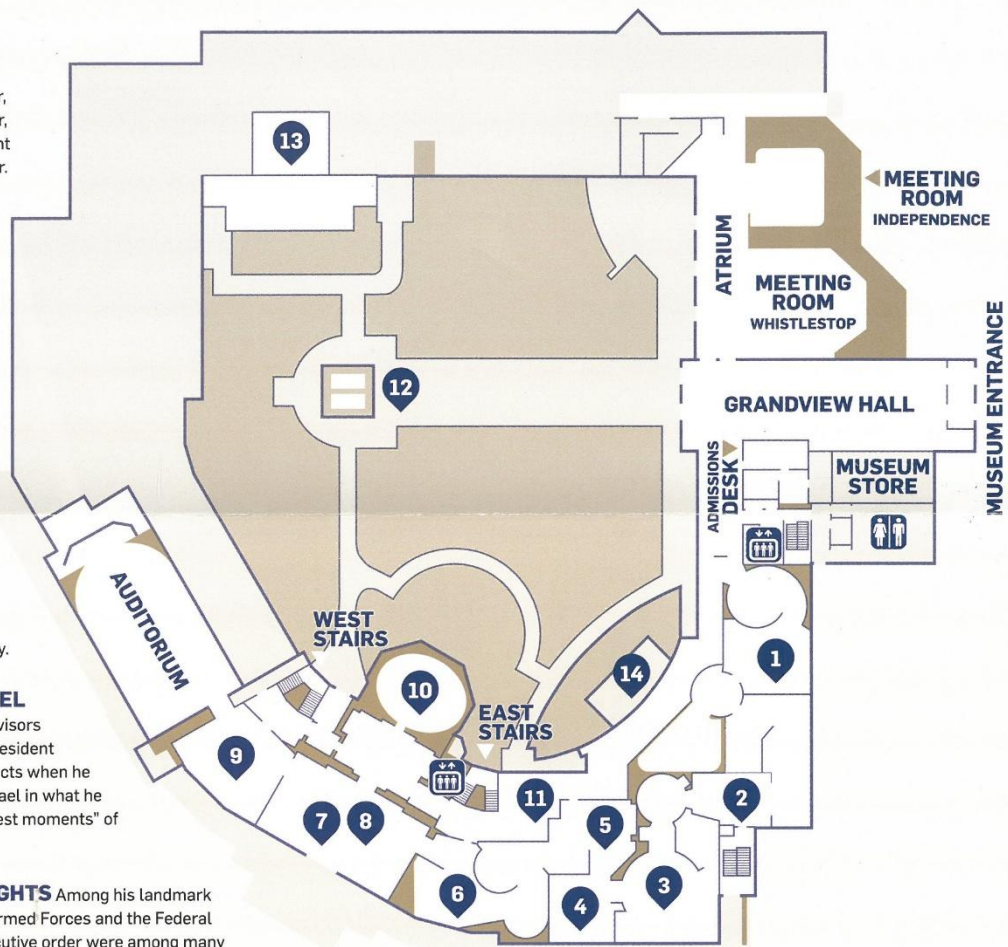
IT'S SECOND TERM New international threats, d domestic challenges dominated President Truman's office.

DEPENDENCE Instead of running for a third term,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with his family, where he and worked to build this Presidential Library.

BENTON MURAL The vibrant *Independence* the West mural by Thomas Hart Benton portrays the ile and their interests along the Santa Fe, California, and mid-19th century.

IN WASHINGTON Learn more about the Trumans' ars they made Washington, D.C., their home away from out the President's extensive White House renovation.

ICE Experience the office of the most powerful leader / as it was in 1950 during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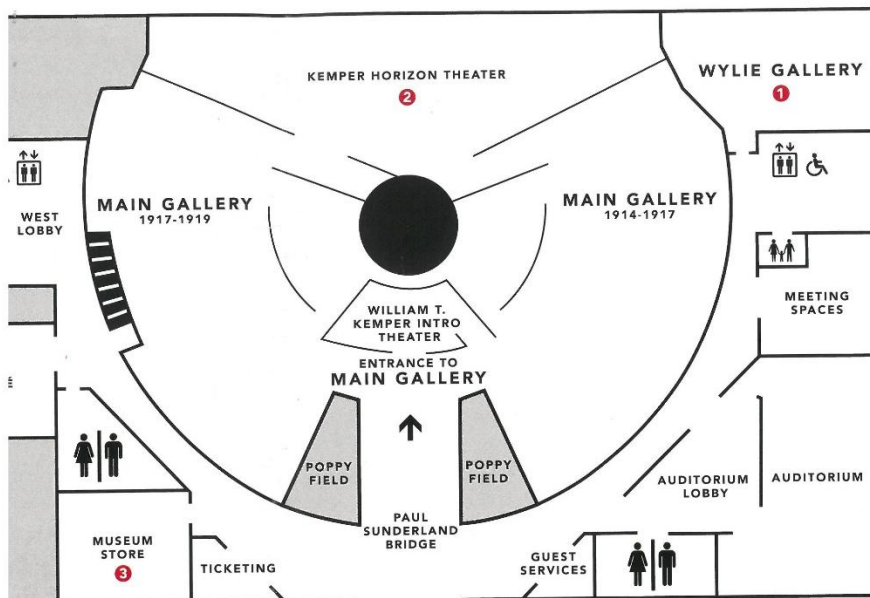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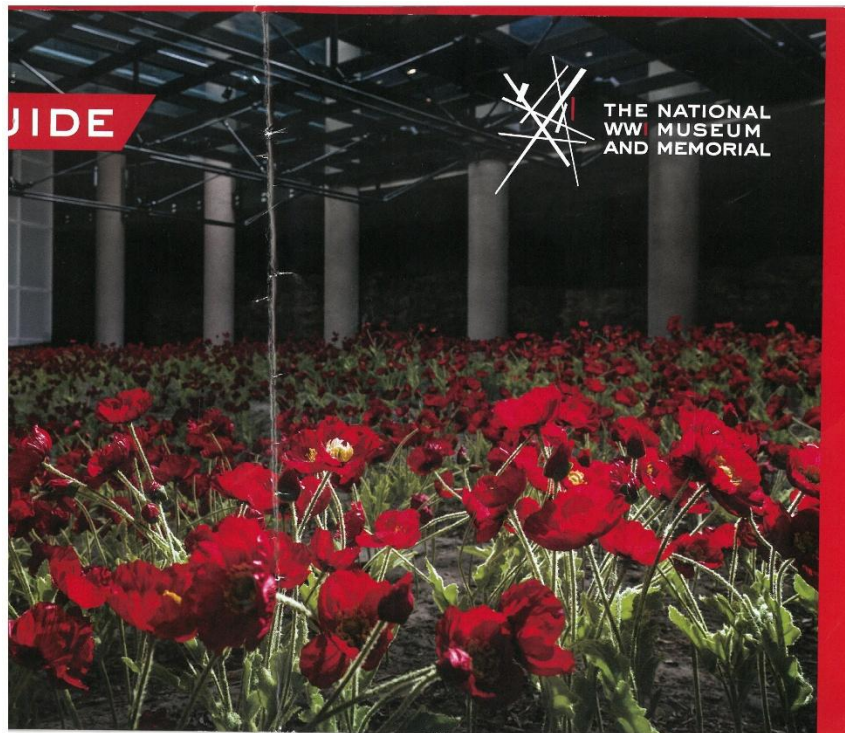
COURTYARD

- 12 GRAVESITE** The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is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President Truman, his wife Bess, their daughter Margaret, and her husband E. Clifton Daniel, Jr.
- 13 PRESIDENT TRUMAN'S OFFICE** President Truman used this office daily from 1957 to 1966. View the office from an adjacent gallery that features exhibits on Truman's post-Presidential years.
- 14 FLAME OF FREEDOM** Dedicated on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the American Legion, the Eternal Flame of Freedom was a gift from the American Legion Tirey J. Ford Post 21 of Independence.

UADDV C TDIM & N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博物館相關資料

摺頁



MAIN LEVEL

四、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相關資料

簡介及地圖

Historical Timeline

1937 - the first officially purchased collectio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und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40 - holdings grew to 20,800 volumes within Suzzallo Library

1946 - establishment of the Far Easter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collection became known as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adding Japanese and Korean titles throughout the 1940s and 50s

1950 -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moved to the basement of Thomson Hall

1976 - the library moved to its current location in Gowen Hall and is renamed the "East Asia Library"

1990s - reaching space constraints once again, the library gains additional auxiliary stacks spaces in Gowen, Smith and Kane Halls

2022 - in recognition of a transformational \$6 million gift from the Atsuhiko and Ina Goodwin Tateuchi Foundation, the library is renamed the Atsuhiko and Ina Goodwin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2023 - completed Phase 1 renovations

W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elcome!

On behalf of all our staff,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the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in your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lease explore our library and the many unique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that make it such a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 for our community--on campus, throughout our region, and around the globe. As part of your visit, I hope you will also enjoy learning about the incredible history of our library and the many ways in which you, our community have helped shape and grow our proud tradition for excellence.

Hyokyoung Yi
Hyokyoung Yi
Interim Director,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Korean Studies Librarian



The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is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of Gowen Hall, one of the architecturally iconic buildings within the University's Liberal Arts Quadrangle (i.e. The Quad), a popular gathering place known for the beautiful cherry blossoms in the heart of the Seattle campus.


The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is one of the premiere libraries of its kind in North America. In addition to its world-renowned collections, our staff work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faculty,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hat enhance teaching,

Total collection holdings as of June 2023 are approximately **800,000 volumes: approximately 271,000 Chinese, 186,000 Japanese and 154,000 Korean print books and 126,000 e-books**, plus a sizable number in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Manchu, Mongolian and Tibet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studies librarians provide **multilingual reference and instructional services** for faculty, students and other users. The libraries' workshops, book talks and lectures provide a variety of community programming and research support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studies.

We continue to expand digital offerings including born-digital works and electronic access to collections while maintaining a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collecting, preserving and making accessible those traditional texts that remain essential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rimary sourc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ateuchi East Asia Library 3rd Floor



Information Desk
Checking in/out books, information about reserves and collections. Feel free to come up and ask about the library!

Display
Currently publications from UW East Asian studies faculty are on display, along with special objects from collections.

New Arrivals
New books are featured on this display for about a month. (Categories: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Quiet Study Spaces
We offer various reservable study spaces. In the next phases of TEAL's renovation, this space will be converted into instruction/seminar rooms


Librarians Office Area
China/Japan/Korea Studies librarians welcome appointments and/or walk-in consultations for any help with references.

Stacks and Study Spaces
Call# A-BL
A great place for focused studying. Library-use-only references, the Language Learning collection, and the initial part of circulating collection are shelved here.


Artworks
From Japanese calligraphy to Korean photography, beautiful artworks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s in the library.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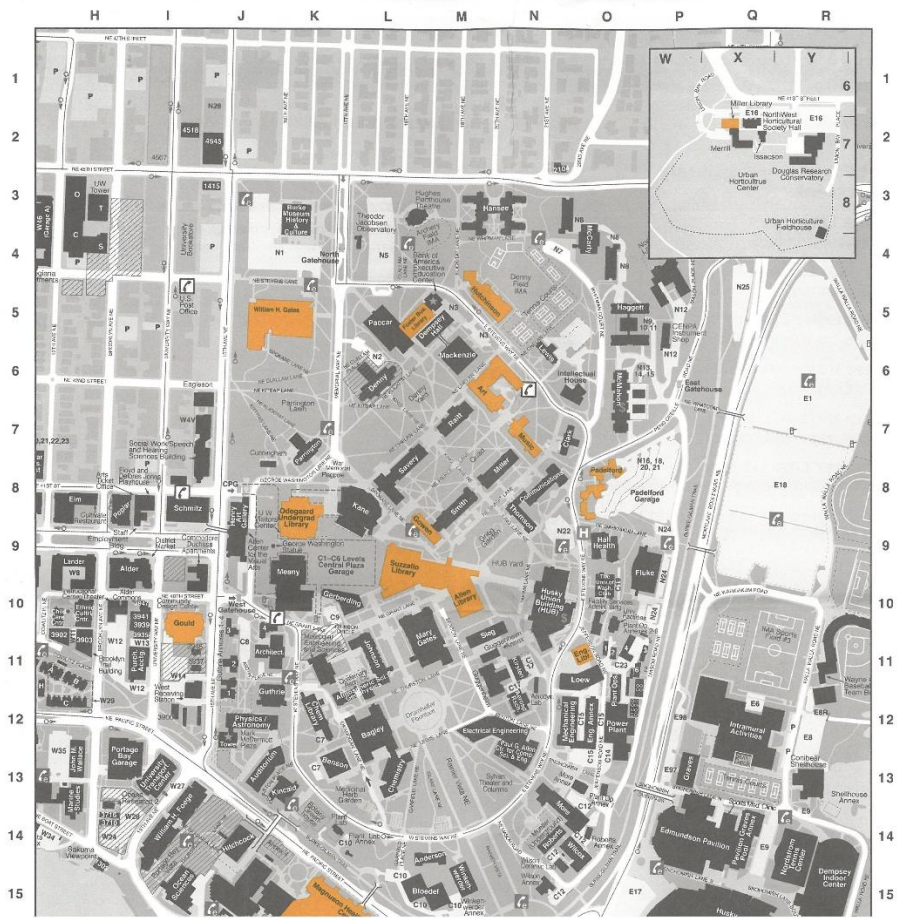
3



2



3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AND UNITS

Art Library 101 Art Building	<i>Map: M-6</i> 206-543-0648	Suzzallo and Allen Libraries	<i>Map: L-9, M-9</i>
Built Environments Library 334 Gould Hall	<i>Map: I-10</i> 206-543-4067	Circulation Suzzallo Library, 1st Floor	206-543-2553
Drama Library 145 Hutchinson Hall	<i>Map: M-4</i> 206-543-5148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Maps, Microforms & Newspapers Collections Suzzallo Library, Ground Floor	206-543-4164
East Asia Library 322 Gowen Hall	<i>Map: M-8</i> 206-543-4490	Information Suzzallo Library, 1st Floor	206-543-0242
Engineering Library Engineering Library Building	<i>Map: O-11</i> 206-543-0740	Allen Library North, Ground Floor	206-543-0242
Foster Business Library 100 PACCAR Hall	<i>Map: L-5</i> 206-543-4360	Library Account Services Suzzallo Library, 1st Floor	206-543-1174
Friday Harbor Library Friday Harbor, Washington	<i>Map: *</i> 206-616-0758	Media Arcade Allen Library, 3rd Floor	206-221-1063
Gallagher Law Library William H. Gates Hall, Floors L1 and L2	<i>Map: J-5</i> 206-543-4086	Office of the Vice Provost for Digital Initiatives and Dea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llen Library North, 4th Floor	206-543-1760
Health Sciences Library (HSL) T-334 Health Sciences Center	<i>Map: L-15</i> 206-543-3390	Research Help & Information Suzzallo Library, 1st Floor	206-543-0242
Mathematics Research Library C306 Padelford Hall	<i>Map: O-8</i> 206-543-7296	Research Commons Allen Library South, Ground Floor	206-685-1113
Miller Horticultural Library Center for Urban Horticulture	<i>Map: X-7</i> 206-543-0415	Special Collections Allen Library South, Basement	206-543-1929
Music Library 113 and 19 Music Building	<i>Map: N-7</i> 206-543-1168	UW Bothell Library 18225 Campus Way NE, Bothell, Washington	<i>Map: *</i> 425-352-5340
Odegaard Undergraduate Library Odegaard Undergraduate Library	<i>Map: K-8</i> 206-543-2990	UW Tacoma Library 1900 Commerce Street, Tacoma, Washington	<i>Map: *</i> 253-692-4440

* located off Seattle campus or outside Seattle